遼與北宋舍利塔內藏經之研究

沈雪曼*

【摘要】本文擬觀察北宋與遼代佛教舍利塔內藏經的現象，藉由對其建築結構與出土品內容的觀察探討兩地舍利塔內藏經的相似與相異處，從而提出遼與東南沿海地區北宋佛教文化的特殊關連，並且重新檢討遼代佛教文化的歸屬。本文將提出幾點主要看法：一、遼代「舍利埋藏」(sarîra relic deposits)特重佛陀的「法舍利」，亦即佛教經典之供養。二、遼代的法舍利供養同時也是爲備「末法」來臨所建，亦即「存經以備法滅」。三、遼代舍利埋藏形制、內容及其對某些經典的特殊喜好，反映遼代佛教文化與日韓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舍利埋藏的密切關係，而與唐宋中原地區傳統有根本的差異。本文討論的範圍限於爲釋迦牟尼佛舍利所建的佛塔，討論對象爲北宋和遼代舍利塔中發現有舍利埋藏並有出土佛教經典者。目前已發掘並經發表的北宋和遼代舍利埋藏共有六十一處；在二十二處遼代舍利埋藏中有十三處出土經典(附錄一)，比例甚高；而在三十九處宋代舍利埋藏中，有十二處出土經典，並且這十二處舍利埋藏中又有九處集中在江浙地區(附錄二)，可見該地區與「舍利塔內瘞藏經典」的活動間關係密切。

關鍵詞：遼代　法舍利　法身　末法　東北亞　海上交流　江浙　彌陀淨土

遼代法舍利塔

本文首先討論遼代的「法舍利埋藏」，也就是將佛教經典作為佛陀的「法舍利」安置在佛塔中的作法。① 以下討論將集中在兩個重點：一是遼代的「末法」觀念如何將「藏經」(scripture deposits)與「舍利供養」(relic veneration)相連繫；二是遼代法舍利埋藏所反映的遼人以經典「具現」(realise)佛陀之實存(presence)的想法。

一、存經以備法滅

一九八八年遼寧朝陽北塔考古勘查隊在清理北塔(即遼代延昌寺塔)塔剎

* 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東亞部副研究員

① 參見附錄一：「考古出土遼代舍利埋藏一覽表」。該表列出已發表之經考古發掘和整理的遼代舍利埋藏；其中出土有佛教經典者亦有另外標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發現剎頂第十二層檐內有遼代重熙十二年(1043)所建的天宮（圖1)。在此天宮前立有一件刻在石版上的「物帳」。該「物帳」記載奉納天宮的物品詳目，文末附記著：「大契丹國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午時再葬。像法更有八年入末法，故置斯記。」② 這一銘文顯示時人在重葬佛舍利時，心中掛念的是「末法」的即將來臨，並且清楚地瞭解是「末法」將在八年後到來。③ 次年(即 1044 年)在同塔塔基內增建地宮(圖 1)，地宮中央供奉陀羅尼石經幢一座，經幢下方刻有內容相似的銘記：「大契丹國重熙十三年歲次甲申，四月壬辰，朔八日己亥午時再葬。像法更有七年入末法。」④

「末法」是在東亞佛教圈內普遍相信的佛法三階段論的最末階段。⑤ 一般認為佛教的發展會在經過「正法」和「像法」兩階段後進入末法階段，此時「佛、法、僧」三寶將滅，而且眾生不求佛法、僧尼亦不種善根。⑥ 尤為甚者，作為佛法之實體的經書文字均將消滅殆盡，⑦ 無怪乎遼人對末法如此擔憂。然而，中國早在北朝(386-581)和唐代(618-907)即已存在末法觀念，當時的人也都認為他們所生存的時代已是或已屆末法。那麼為何在遼代又出現「末法將至」的想法？

---

② 見《文物》1992.7，頁 17；頁 14，圖 30。現存磚塔的方形結構及塔身彩繪的圖樣顯示該塔首建於唐代。見《文物》1992.7，頁 30-32。遼代時在塔身下半部增建目前所見飾有磚雕四方佛圖樣的部份。

③ 該天宮出土的金銀四重經筒第三重也刻有類似銘文：「重熙十二年四月八午時葬。像法只八年。提點上京僧錄宜演大師賜紫沙門蘊珪記。」見《文物》1992.7，頁 6；頁 9，圖 13。

④ 見《文物》1992.7，頁 22；頁 20，圖 48。

⑤ 關於東亞地區佛法三階段論的發展，詳參 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ure Time: Studies in a Buddhist Prophecy of Decline (Berkeley: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91), pp. 95-118.。

⑥ 許多經典中均提及末法時期佛法隱滅。例如：不空(705-774)所譯的《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道：「後世末法逼迫時，多有眾生習行非法，應墮地獄。不求佛法，僧不種殖善根。為是因緣，妙法當隱。」見《大正新修大藏經》1022A，卷 19，頁 711 上。

⑦ 善導(613-681)《往生禮讚偈》(1 卷，《大正新修大藏經》1980, 47: 438 中-448 中)，道：「萬年三寶滅。」見《大正新修大藏經》1980，卷 47，頁 441 下。又，《善見律毗婆沙》(譯於 448 年)卷１８道：「萬歲後經書文字滅盡。」見《大正新修大藏經》1462，卷 24，頁 796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於末法來臨時日的不同見解，主要肇因於對正法、像法二時期之長短的不同見解。⑧南朝僧慧思(515-577)基於「佛入滅後正法五百年、像法千年」的看法，在其〈立誓願文〉(成於558年)中指出其出生時的乙未年(515)是末法第八十二年；換言之，慧思認為末法已於公元四三四年開始。⑨到了隋代(581-618)，「正法千年，像法千年」的新見解已經出現，僧吉藏(549-623)所著《法華玄論》可為代表。⑩該見解又與佛陀入滅年代新解——周穆王五十二年(西元前949年)——相結合，⑪從而產生「末法將於公元一〇五二年到來」的看法。公元一〇五二年便是遼朝興宗重熙二十一年，也正是前述延昌寺塔銘記所指末法來臨之日。

當像法時期到了盡頭，人們相信佛法即將滅盡，因此佛教徒都感到迫切的「保存佛法於有形」的需要，⑫於是產生以石材刻經保存佛法的作法。自北齊(550-577)至隋代，在以鄴城為中心的今河北省南部以及山東省地區即已出現刻經以備法滅的例子。⑬其中由隋僧靜琬(卒於639年)發願起造的雲居寺刻經(在

---

⑧ 早在「正、像、末」三期的觀念傳入中國之前，在印度即存在對正法、像法兩時期之長短的爭議。關於史上對於「正、像、末」三期長短的各種見解，參 Jan Nattier, ibid., pp. 27-64.

⑨ 〈南嶽思大師立誓願文〉道：「至癸酉年年八十。二月十五日方便入涅槃。正法從甲戌年至癸巳年，足滿五百歲止住。像法從甲午年至癸酉年，足滿一千歲止住。末法從甲戌年至癸丑年，足滿一萬歲止住。…我從末法初始立大誓願…我慧思即是末法八十二年，太歲在乙未十一月十一日…生。見《大正新修大藏經》1933，卷46，頁786下-787上。另參 Kenneth K.S. Chen, Buddhism: The Light of Asia (New York: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Inc., 1968), p. 158.」

⑩ 《法華玄論》卷十。見《大正新修大藏經》1720，卷23，頁450上。

⑪ 法琳(572-640)，《破邪論》卷一：「《周書異記》云：…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佛入涅槃也。」見《大正新修大正藏》2109，卷52，頁478中。又，《破邪論》卷二云：「釋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萬年。」見《大正新修大藏經》2109，卷52，頁485上。《周書異記》不見於現存唐宋類書或藝文志中，可能於唐代即已佚失。

⑫ 慧思〈立誓願文〉即表達於末法中保存經典的急迫需要。「末法從甲戌年至癸丑年，足滿一萬歲止住。…餘經次第滅，《無量壽經》在後得百年住，大度眾生，然後滅去至大惡世。我今誓願持令不滅，教化眾生至彌勒佛出。」見《大正新修大藏經》1933，卷46，頁786下-787上。

⑬ 河北省南部的響堂山石窟即是一例。詳參 Katherine T. Mino, *Bodies of Buddhas and Princ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今河北省房山縣）最為人知，並且延續時間最長。在房山雲居寺址一殘存銘文上即記載著靜琬在此地刻造石經並藏之石室，乃是意在以耐水火災變的石刻以於「未來佛難時擬充經本」，亦即確保後代習佛之人在末法時代結束之後、未來佛（即彌勒佛）自兜率天宮降生說法之時，仍有經典可讀。⑭

雲居寺的刻經大業在遼代達到高峰，並且在遼興宗朝（1031-1055在位）成為朝廷定期資助的重要項目。⑮目前雲居寺現存的一萬五千餘片經版中，有近萬

---

of the Xiangtangshan Caves: Image, Text, and Stûpa *in Buddhist Art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550-577)*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6), pp. 153-201. 關於其他中國佛教刻經，參見気賀沢保規，〈唐代房山雲居寺の發展と石經事業：附房山石經山洞窟所藏隋唐石經一覽表〉，收入気賀沢保規編，《中國仏教の石經研究：房山雲居寺石經を中心に》（京都，1996），頁27-30。傅振倫認為石刻佛經在北齊時代即已出現。見傅振倫，〈遼代雕印的佛經佛像〉，收入陳述輯，《遼金史論集》1（1987），頁211-220。

⑭ 靜琬貞觀八年（634）銘文道：「今於此山鐫鑿華嚴經一部永留石室，劫火不焚…為未來佛[法]難時擬充經本。」此外，貞觀二年（628）靜琬題刻：「釋迦如來正法、像法凡千五百餘歲，至今貞觀二年已浸末法七十五載。佛日既沒，冥夜方深，瞽目群生，從茲失導。靜琬為護正法，率己門徒知識及好檀施，越就此山巔，刊華嚴經等一十二部。冀於曠劫濟度蒼生，一切道俗同登正覺。」參正京圖書館金石組、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石經組編，《房山石經題記匯編》（北京，1987），頁1-2。該銘記顯示，依靜琬的算法，末法已於西元554年開始。有關靜琬刻經的相關題記尚有〈涅槃經堂題刻〉〈鐫華嚴經題記〉（634），〈涿鹿山石經堂記〉（809）、〈白帶山雲居寺碑記〉（不晚於1005）、〈重修雲居寺碑記〉（1005）、〈雲居寺東峰續鐫成四大部經記〉（1058）、〈雲居寺釋迦佛舍利塔記〉（1117）、〈大遼涿州涿鹿山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1118）。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石經組編，前引書，頁1-2，15-16，19-21，21-23，23-24。

⑮ 遼聖宗（983-1031在位）、興宗（1031-1055在位）和道宗（1056-1101在位）三朝是遼代佛教最興盛的時期，皇室對佛教活動多所參與。參神尾一春，《契丹仏教史考》（東京，1982），頁7-15；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J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36 (Philadelphia/ New York, 1949), pp. 291-295。另參朱子方，〈遼代佛學著譯考〉，收入陳述輯，《遼金史論集》2（1987），頁175-198，特別是頁175；傅振倫，〈遼代雕印的佛經佛像〉，收入陳述輯，《遼金史論集》1（1987），頁210-223。有關遼代雲居寺刻經所運用的「大量製造」的方法，參 Lothar Ledderose, 'Massenproduktion angesichts der Katastropie', *Asiatische Studien/Études Asiatiques* 4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片是雕造於遼代；僅於興宗一朝，即有一百六十一部經典據契丹大藏經刻成。據趙遵仁〈雲居寺東峰續鐫成四大部經紀〉(1058 紀年)記載，幽州刺史韓紹芳於太平七年(1027)造訪雲居寺，發現雲居寺刻經已荒廢多時，⑯ 乃稟報朝廷。不久，遼聖宗(983-1031 在位)委僧可玄提點鐫修；迨興宗繼位，更進而由朝廷定期資助雲居寺刻經，使靜琬刻經存法之志得以延續。⑰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前述延昌寺塔天宮、地宮在內，在目前已發掘的十七處紀年遼代舍利埋藏遺址中，僅有兩處是在興宗朝之前所造，其餘皆集中建造於興宗及後繼兩位皇帝在位期間。此外，重熙七年(1038)遼興宗還在西京(今山西大同)華嚴寺敕建薄伽教藏殿收藏五百七十九秩藏經。⑱ 既然重熙二十一年(1052)是末法將至之年，「保存佛法」自然成為朝廷面臨的迫切課題。⑲ 遼代慶州的釋迦佛舍利塔(位於今內蒙古巴林右旗)塔剎相輪樑內經藏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造的。據釋迦佛舍利塔塔剎出土石碑記載，該塔天宮係由章聖皇太后敕建以瘞藏「法舍利」陀羅尼，並且於興宗重熙十八年(1049)全部建造完成。⑳這一年與同是遼代皇室成員及主要高僧主導建立的朝陽延昌寺塔兩處舍利埋

(1990), pp. 217-233。有關遼代皇室對雲居寺刻經計畫的贊助，參谷井俊仁，〈契丹仏教政治史論〉，收入気賀沢保規編，前引書，頁 133-191。

⑯ 目前為止發現的一百多件唐代刻經證明此說不實。見中國佛教協會，《房山雲居寺石經》(北京，1978)，頁 3-5；《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北京，1986)，頁 121-122。

⑰ 「太平七年…韓公諱紹芳…得古記云：『幽州沙門釋淨琬精有學識，於隋大業中發心造石經一藏，以備法滅。…』…乃知自唐已降，不聞繼造佛之言教，將見其廢耶？…已具上事，奏於天朝…，琬師之志因此繼焉。迨及我興宗皇帝之紹位也，…常念經碑數廣，匠役程遙，…重熙七年，於是出御府錢，委官吏佇之，歲析輕利，俾供書經鐫碑之價。」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石經組編，前引書，頁 23-24。在現存的 15,061 片石經版中，僅靜琬所刻之 146 片經版係嵌在雷音洞石壁上，其餘都是禁錮或埋藏在小西天的八個石窟洞和遼代所建的壓經塔下。有關房山石經簡史，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頁 121，及中國佛教協會，前引書，頁 3, 9；頁 18，註 21。

⑱ 華嚴寺薄伽教藏殿的遼代經文今已不存。但由同寺所存金大定二年(1162)石碑得知遼代經藏的歷史。見山西雲崗石窟保管所編，《華嚴寺》(北京，1980)，頁 2-7。

⑲ 谷井俊仁曾提出遼興宗資助石經及契丹大藏經的雕印係為確立其個人「法王」的地位。在此似有重新商榷的必要。參谷井俊仁，前引文，頁 158-172。

⑳ 該一紀年在天宮所出的兩個石刻題記上有明確記載。見《文物》1994.12，頁 4-5；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藏僅相距五年，㉑而與預期到來的「末法」時期則只有三年之遙。再次反映了遼代皇室存經以備法滅的決心。

二、「法身舍利」信仰

然而釋迦佛舍利塔天宮藏經不只消極地為保存經典而做，更重要的是它還是建來供養佛陀的「法身舍利」。據考古報告表示，釋迦佛舍利塔天宮係建置於該塔塔剎相輪樑中五室（圖 2）。在該天宮眾多出土品中最重要且佔數量最多的是裝藏有佛經及陀羅尼的一百零九個塔形舍利筒（參圖 3）。㉒據前引石碑記載，釋迦佛舍利塔「相肚中安置金法舍利，并四面安九十九本帳竿陀羅尼」；㉓而對照天宮實際出土物品內容可以得知「金法舍利」指的是此天宮中室發現的刻寫在金銀版上的陀羅尼；「九十九本帳竿陀羅尼」則是指東、西、南、北四室中裝置於塔形舍利筒內的陀羅尼。㉔由此可知陀羅尼在遼代當時被稱為「法舍利」。除此之外，該天宮中出土的諸多經典和陀羅尼的經帙上均有墨書「舍利」二字，更進一步證實遼代人視經典為舍利，從而建塔崇奉的情況。㉕

釋迦佛舍利塔天宮出土的另一件題記顯示該舍利埋藏的形制及內容均有所本，乃是依照《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的指示所建。該題記鐫刻在一銀版上，並自名為〈功能法〉。這〈功能法〉指示人們造塔，並於相輪樑中安置九十九本〈相輪樑中陀羅尼〉。它還指出凡是據此法供奉九十九本〈相輪樑中陀羅尼〉者，其功德無量，就如同供養九萬九千佛舍利。㉖這一〈功能法〉並非憑空捏造，

㉑ 銘記資料顯示宣演大師蘊珪在延昌寺天宮、地宮和釋迦佛舍利塔天宮三處舍利埋藏均居主導位置，顯然極受遼代皇室信任。見《文物》1992.7，頁 6；頁 22，圖 51；頁 23。《文物》1994.12，頁 21，圖 50；頁 33，附錄一。

㉒ 見《文物》1994.12，頁 4-33。

㉓ 《文物》1994.12，頁 33，附錄一。

㉔ 考古報告稱共有 109 件經筒在相輪槏五室中發現，其中兩件在中室，107 件在其它四面四室中。報告中並未說明是否四室中的 107 件經筒均如碑文所載藏有〈帳竿陀羅尼〉。見《文物》1994.12，頁 8-9。

㉕ 見《文物》1994.12，頁 18。

㉖ 「善男子應當如法書寫此咒九十九本，放相輪樑四周安置。又寫此咒及功能法，放樑中心密覆安處。如是作已，則為建立九萬九千相輪樑已；亦為安置九萬九千佛舍利已；亦為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是摘自《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㉗因此釋迦佛舍利塔天宮藏經之所以造立在塔剎相輪樸內，以及其藏經內容都是根據《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而做。㉘

相對於「身舍利」指攝釋迦牟尼佛肉身火化後的遺存，「法舍利」指的是佛陀的精神遺存，也就是佛教經典。而在遼代法舍利埋藏的情況，這些經典不僅只是釋迦牟尼佛的「法舍利」，同時也是佛陀「法身」(即佛的三身之一)的舍利，因此這些供奉佛教經典的遼代「法舍利塔」也同時是「法身舍利塔」。一九七六年在倒塌的河北省房山縣北鄭村塔塔身及塔基發現兩處舍利埋藏；二者分別供奉刻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陶製及石製經幢，從而可以認為是一「法舍利塔」(圖 4)。㉙北鄭村塔塔身下方嵌飾一列印有「法舍利塔」字樣的花紋磚也證明其為一法舍利塔(圖 5)。然而，在這些花紋磚的文字下端還印有一座佛塔，塔內有四行〈法身偈〉。這一〈法身偈〉與「法舍利塔」字樣的組合係以圖解的方式說明了「供養〈法身偈〉的佛塔便是法舍利塔」的觀念；因此，造立法舍利塔也就是供奉佛陀的法身。㉚換言之，法舍利塔中所供奉的佛教經典實為佛陀法身的「實現」(manifestation)。

供養〈法身偈〉的作例幾乎不見於北宋舍利塔出土例，但在遼代舍利塔中卻有不少作例，凸顯出遼代舍利信仰與北宋在本質上的差異。就目前所知，除房山北鄭村塔外，同屬房山縣的雲居寺北塔下方亦貼有與北鄭村塔磚幾乎一模一樣的花紋磚(圖 6)。㉛又，河北薊縣獨樂寺塔身也刻磚雕有〈法身偈〉，然其

造九萬九千佛舍利塔；亦為己造九萬九千八大寶塔；亦為己造九萬九千菩提場塔。」見《文物》1994.12，頁 15，圖 33。

㉗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1024，卷 19，頁 719 上。

㉘ 《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的主旨在勸進人們造塔供奉代表佛教如來藏思想的五大陀羅尼，其中也包括〈相輪樸中陀羅尼〉。由於該經能夠消災解厄，免除地獄之苦，因而在遼代極為流行，在諸多現存遼塔中均可見到，甚至若干遼塔就逕以「無垢淨光」命名。

㉙ 《考古》1980.2，頁 147-158。《佛頂尊勝陀羅尼經》鼓勵人們書寫此陀羅尼於經幢上，並置之於高山、高樓或佛塔中，以使信者塵沾影覆蒙其利益。見《大正新修大藏經》968，卷 19，頁 353 上-355 上。

㉚ 見《考古》1980.2，頁 150；圖版 8:2。該〈法身偈〉偈文摘自《佛說造塔功德經》：「諸法因緣生，我說是因緣；因緣盡故滅，我作如是說。」見《大正新修大藏經》699，卷 16，頁 801 中。

㉛ 房山雲居寺與房山北鄭村舍利塔間的密切關係還可見於北鄭村塔地宮出土的一件題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偈語文字順序稍有不同。㉜遼寧瀋陽卓望山無垢淨光塔塔基內瘞埋的石函兩旁奉有二石碑，其中一碑起首便刻有〈法身偈〉。〈法身偈〉闡述佛教義理中最根本且恆久存在的「因緣」和「生滅」的道理，而被釋迦牟尼佛名為「佛法身」；㉝因此遼代這些法身舍利塔的存在也說明遼代人對佛法具備深刻理解，與北宋黃河流域地區將佛陀入滅等同於凡人死亡的世俗化想法有所不同。㉞

內蒙巴林右旗的遼慶州釋迦佛舍利塔天宮出土的銘文還進一步顯示此天宮中所藏經典不止是佛的法身舍利，還是佛陀的「全身舍利」。在出土的一卷《法華經》經帙上有一題記：「法華經一部全身舍利在此塔中」。㉟該文句節自《法華經》〈法師品〉：「藥王，在在處處，若說、若讀、若誦、若書，若經卷所住處，皆應起七寶塔。極令高廣嚴飾，不須復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來全身。」㊱《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也闡述相同的「經典為佛全身」的觀念。㊲法崇（活動於 763-764 年）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疏》進一步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法華經》比擬道：「梵云設利羅，此云體也。即是舍利之體。今此塔中不須更安舍利，即是其舍利之塔也，與《法華經》供養塔無異也。」㊳

不僅如此，釋迦佛舍利塔天宮中的經典還是諸佛三身的「具現」(realisation)。釋迦佛舍利塔天宮出土的《佛形像中安法舍利記》引《一切如來

(909 紀年)：「弟子支處兼有願造小佛頂真言，送上石經寺，合家大小供養。」見《考古》1980.2，頁 152，圖 7；頁 8。

㉜ 其偈語內容如下：「諸法從緣起，如來說是因(在塔身東南面)；因緣盡故滅，我作如是說(在塔身西南面)。諸法從緣起，如來說是因(在塔身西北面)；彼此因緣盡，是大沙門說(在塔身東北面)。」見《考古學報》1989.1，頁 89-90；頁 86，圖 4。

㉝ 見《佛說造塔功德經》，《大正新修大藏經》699，卷 16，頁 801 中。

㉞ 關於唐代和北宋黃河流域地區的舍利埋藏所反映之將「佛舍利供養」與「世俗埋葬」等同的趨勢，在筆者博士論文中有詳細討論。參見 Hsueh-man Shen, *Buddhist Relic Deposits from Tang (618-907) to Northern Song (960-1127)*, 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0, Chapter 3: 'Shrîra Relic Deposits and Tomb Burials.'

㉟ 見《文物》1994.12，頁 27；頁 24，圖 53。

㊱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262，卷 9，頁 31 中。

㊲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天帝，彼人能如是供養者，名摩訶薩埵。真是佛子持法棟梁，又是如來全身舍利窣堵波塔。」見《大正新修大藏經》971，卷 19，頁 363 中。

㊳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1803，卷 39，頁 1037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道：「佛告金剛手菩薩：『一切如來未來、現在，及已涅槃者，全身舍利皆在《寶篋印陀羅尼》中，是諸如來所有三身亦在其中。』」㊴ 這一《佛形像中安法舍利記》說明諸佛三身及其全身舍利俱在此陀羅尼中，因此供養此陀羅尼即是供養諸佛，而供養經典的法舍利塔也就是供養「諸佛全身舍利」的舍利塔。更重要的是，這些經典具現(realise)諸佛的存在；因此，有經典所在的法舍利塔便有佛陀存在塔中，從而確立佛法未滅、尚存於世間。基於佛教經典如此弘大的效能，無怪乎自認生存在末法將至的黑暗時代的遼代人要如此重視法舍利的供養了。

三、佛法的人格化形像：法身佛像

另一方面，遼代的法舍利信仰還表現在遼代舍利塔運用的圖像上；這些圖像可說是以視覺形象進一步闡釋遼代的法舍利信仰。早在一九三〇年代，日本學者關野貞及竹島卓一在對遼金佛教建築進行調查研究時，即已注意到遼代磚塔的圖像設計頗為一致，多是以密教金剛界「四方佛」結合代表釋迦牟尼佛生平八大主要事蹟的「八大靈塔」為主題。㊵ 前述設有天宮、地宮舍利埋藏的遼寧朝陽延昌寺塔即為一例。該塔依唐塔改建，保留唐塔的方筒形結構。遼代時將塔基加寬、加高，並在塔身中段加飾磚雕。四壁中心主佛由南面右旋分別是寶生佛、阿彌陀佛、不空成就佛和阿門佛等金剛界「四方佛」。㊶ 四主佛頂上

㊴ 釋迦佛舍利塔天宮共出土四本《佛形像中安法舍利記》。該記未收錄於《大正新修大藏經》，可能是遼代集撰但已失佚的經本。據考古報告所附圖版顯示，《佛形像中安法舍利記》係由燕京憫忠寺僧智光集撰。見《文物》1994.12，頁 16，圖 35。唐僧不空(705-774)所譯的《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現存兩種版本，見《大正新修大藏經》1022A 和 1022B，《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宣揚一切如來三身皆在此經中，其法力於末法時期亦不衰減；凡造塔或於佛形象中供養此經者得一切如來庇護。見《大正新修大藏經》1022A，卷 19，頁 710 上-712 中；1022B，卷 19，頁 712 中-715 上。

㊵ 見關野貞、竹島卓一，《遼金時代の建築と其の仏像》(東京,1944)，頁 183-190。除了以下將要討論的遼寧朝陽北塔(即延昌寺塔)之外，不少現存的遼塔也都應用類似的圖像或以此為基本圖式再加以變化。例如遼寧朝陽南塔、雲接寺塔、瀋陽無垢淨光舍利塔、內蒙古寧城大塔等。

㊶ 四佛的坐騎各有不同：寶生佛乘五馬，阿彌陀佛乘五孔雀，不空成就佛乘五金翅鳥，陽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各有一華蓋，華蓋左右有一對飛天，飛天下方為兩菩薩單膝著地向中心主佛獻供。菩薩旁另有二小塔，塔內各飾一尊佛像。在二小塔與菩薩間，還有兩碑立蓮座上，分別刻記八大靈塔名號。這八大靈塔記述釋迦牟尼佛生平的八項重要事蹟，由延昌寺塔南面右旋依次是：「淨飯王宮生處塔」、「菩提樹下成佛塔」、「鹿野苑中法輪塔」、「給孤獨園名稱塔」、「曲女城邊寶階塔」、「耆闍崛山般若塔」、「菴羅衛林維摩塔」和「娑羅林中圓寂塔」（參圖 7）。

在密教金剛界圖像中，寶生佛、阿彌陀佛、不空成就佛和阿門佛所組成的四佛，與位居中心位置的大日如來構成「金剛界五智如來」，並代表智慧。五佛之中，以表現佛陀法身的大日如來最為重要。㊷ 然而由於佛陀的法身無形，因此在某些五智如來的圖象中見不到大日如來的形象，延昌寺塔塔身裝飾便是一例。儘管如此，但在該塔天宮、地宮諸文物中卻可見大日如來頻頻以人物形象或以文字形式出現。首先在該塔天宮東側石壁上發現一組線刻三尊佛像，像旁分別刻有題記指明其為「法身佛」、「報身佛」和「化身佛」的三身圖像（圖 8）。㊸其中的「法身佛」是以手作智拳印的大日如來形象出現，而與「化身佛」釋迦牟尼佛實為一體兩面。大日如來還出現在延昌寺塔天宮中裝藏釋迦牟尼佛舍利子的木胎銀函上。該銀函呈長方形，一側刻有釋迦牟尼佛右脅而臥入涅槃的景象，另一側則刻一組三尊佛像，與天宮東側石壁上的三身像如出一轍（圖 9）。

佛乘五象。參關野貞、竹島卓一，前引書，頁 203-211。

㊷ 密教中心經典《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和《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均闡述大日如來為佛法身的觀念。見《大正新修大藏經》848，卷 18，頁 1 上-55 上，以及《大正新修大藏經》865，卷 18，頁 207 上-223 中。另參 Elizabeth Ten Grotenhuis, *Japanese Mandalas: Representations of Sacred Geograph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chapters 1-3.

㊸ 釋迦牟尼佛入滅後，關於究竟應該禮拜「佛陀的遺身」還是他所具現的「佛法」產生不同見解。這些不同見解反映時人對於佛陀存在的實相，以及對於涅槃真義的瞭解有所分歧。「三身」理論便是為解答這些問題而產生。在漢譯經典中出現的「三身」有幾種不同組合，例如：「法、報、應」或「法、應、化」三身等。在遼代延昌寺塔中的「三身」則指「法、報、化」三者：法身指佛陀所具現的永恆佛法；化身指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濟度眾生的佛身；報身則指持因行果德之身。由於各種佛身著重佛陀存在的不同面向，供養佛陀的生身舍利著重紀念佛陀已逝的生身或化身，而供養佛經便是側重在禮拜佛陀永恆不滅的法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㊹此外大日如來還在天宮中的一座藏有經卷的六角形鎏金銅塔上與釋迦牟尼佛以及前述四方佛一同出現。㊺這樣「釋迦牟尼佛與金剛界五智如來」的組合實與延昌寺塔塔身之圖像組合相呼應。

這一圖像組合頗有巧妙的用意。「八大靈塔」表現釋迦牟尼佛生平八大重要事蹟，從而代表其生平，進而代表釋迦牟尼佛本身。㊻而這八大靈塔與金剛界五智如來共同出現，則可認為是為強調釋迦牟尼佛在諸佛中的獨特地位——亦即是在我等所處的娑婆世界中宣說佛法的佛陀。㊼釋迦牟尼佛與諸佛並列出現，不僅反映遼代人對「佛法不滅」的信仰，同時還強調「佛法住於此娑婆世界」的想法，從而強化遼代人在末法危機中對佛法不滅的信心。

以上所述顯示遼代人造塔藏經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為供養佛法；二是為存經以備法滅。遼代舍利塔內藏經的內容不僅反映遼人對「法舍利」的信仰，部份出土例還顯示其所供養之法舍利(即經典)種類和法舍利埋藏之建築結構皆是嚴格遵守某些經典指示而做。遼塔反映的法舍利信仰還表現在這些舍利塔塔身的圖像組合上。以法身佛大日如來為中心的金剛界五智如來與釋迦牟尼佛八大靈塔結合，共同反映遼代的法身信仰。換言之，遼代的法舍利塔用具象的經典以及法身佛形象，將抽象的「法身不滅」的觀念具象化(materialise)，從而鞏固其對於「佛法(或法身)不滅」的信念。

《佛說大乘造像功德經》載釋迦牟尼佛告諸天眾道：「如來身者，法身常身，實不滅度。諸天子，一切諸佛法皆如是，為化眾生有現、有不現。」㊽此番說

㊹ 見《文物》1992.7，頁 9-10，圖 14-16。

㊺ 除此之外，大日如來還與釋迦牟尼佛的八大靈塔一起出現在供養一卷銀版《波羅蜜多心經》的一組舍利函的最外層。見《文物》1992.7，頁 6；頁 8，圖 11。

㊻ 見《八大靈塔名號經》，《大正新修大藏經》1685，卷 32，頁 773 上-773 中。延昌寺塔塔身上的八大靈塔兩兩成對，自該塔南面(正面)起依序排列，與右旋繞塔方向一致。因此人們繞塔禮拜也就同時經歷了釋迦牟尼佛的一生。

㊼ 《佛說阿彌陀經》道，諸佛為釋迦牟尼佛能於濁世中得道並教化眾生，讚其甚為希有，並為造無量功德：「彼諸佛等，亦稱說我不可思議功德，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能為甚難希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諸眾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見《大正新修大藏經》366，卷 12，頁 348 上。

㊽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694，卷 16，頁 791 中。《大般涅槃經》也闡述同一觀念。見《大正新修大藏經》7，卷 1，頁 192 下-193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法意在勸眾生勿執著於其肉身，須知法身才是常住之身，若眾生有可度者，佛陀將出現教化說法。因此，遼代的法舍利塔或可視為時人為求佛陀出現教化以度眾生於末世的一種表現。而鼓勵造塔安置舍利、法藏和〈法身偈〉的《佛說造塔功德經》還說：「如是偈義名〈佛法身〉，汝當書寫置彼塔內。何以故？一切因緣及所生法性空寂故。是故我說名為法身。 若有眾生解了如是因緣之義，當知是人即為見佛。」[49] 由此可見，造塔供養佛陀法藏和〈法身偈〉的遼代人可算是解了因緣之義，而為「見佛」之人。相較之下，唐代和北宋黃淮地區比照俗人葬式埋葬佛陀舍利的作法，則代表一種以世俗的生死觀念理解佛陀入滅的想法。如此看來，北宋佛教徒對涅槃真義的理解可說大大不如遼人了。

北宋東南沿海的舍利塔藏經

有趣的是，在與遼代同時期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也出現不少在舍利塔的地上建築內安藏經典的例子。這些舍利塔藏經多數建於十世紀後半到十一世紀，並且多半是在塔身中心柱內秘藏經典（見附錄二）。這些經藏與遼代不同之處在：它們多數是作為獻納給佛陀的舍利骨或舍利子的供納品而被收藏在舍利塔中。然而由於佛塔中心柱內穴室一般空間較大，能夠容納較多物品，因此多數出土例均包括數量頗多的佛教經典。

這些五代至北宋東南沿海的舍利埋藏與該地區於唐代所建舍利埋藏（多建於塔基下，並且未見有瘞藏經典的實例），無論在結構或內容上均極為不同，因此不免令人懷疑該地區於十世紀中興起的塔內藏經活動是否另有淵源。以下便將以東南沿海諸出土例中發現題記和出土文物數量特豐的三個遺址——蘇州雲岩寺塔塔心室內舍利埋藏（961）、蘇州瑞光寺塔塔心室內Ⅰ號舍利埋藏（1017）和浙江黃巖靈石寺塔塔心室內舍利埋藏（1067，見圖 10）——為討論的中心，觀察其與遼代舍利塔內藏經的異同，並進而指出東南沿海地區與包括遼朝在內的東北亞佛教文化交流的情況。

一、於末法之世藏經以積功德

如前所述，五代及北宋東南沿海地區藏經與遼代藏經在建築結構的運用上

[49]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699，卷 16，頁 801 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分相似。除此之外，部份出土材料顯示東南沿海地區的人們很可能也意識到他們生活在末法時代中。江蘇蘇州瑞光寺塔Ⅰ號舍利埋藏(1017)出土舍利函下的一塊木板上的墨書即顯示該塔塔心室內的經藏是在對末法有所意識的情況下所造：「寓跡僧子端，幸值諸上善人建第三層浮圖，安置諸佛聖賢遺身舍利寶幢，…特捨此木底，…且效聚砂之少善，以茲迴向悉等。真所願者，生生世世興正法似馬鳴，興象法如龍樹。」⑤⓪顯然書寫這段題記的僧人子端十分清楚他所處的時代是沒有佛法高僧存在的「末法」時代。他因此決心效法正法時期的馬鳴菩薩(約一至二世紀)和像法時期的龍樹菩薩(約150-250年)，願在末法之世努力宣揚佛法。⑤① 此外，在北宋東南沿海藏經中常常出現的《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鼓勵人們在末法時代造塔或造像供養此經，從而反映東南沿海藏經與「存經以備末法」有某種程度的關連。⑤②

但是東南沿海地區藏經與末法間的這種關係，又與遼代「藏經以備法滅」的性質不完全相同。在這地區出土的諸多供養人題記顯示，人們捨經入塔是為其本人或家人在此生或來生積攢功德。雖然願文中也往往提及祈求於未來佛降生之時聽聞佛法，但他們更在乎的是藉由獻納經典的行為在末法之世積累功德，從而得以往生西方淨土，在淨土中等待彌勒降生。換言之，救個人於末世穢土、進而使其得以往生淨土才是其主要目的，而所獻經典在將來是否能夠充當彌勒降生說法時的經本，反倒成為其次了。在這種情況下，佛教經典的性質也由佛陀的法舍利，轉化為建立供養人與佛陀間之個人關係的供養品，從而具備人類學上「禮物」(gift)的社會功能與意義。⑤③

東南沿海藏經的這種心理和社會功能清楚地表現在其供納經典類別的選擇

---

⑤⓪ 見《文物》1979.11，頁21。

⑤① 浙江溫州白塔寺II號舍利埋藏(1115)出土一題記也反映對所處末世的擔憂：「日月無光…不忍見天下眾生洛淮海中…若寫經，免一門災難，…寫此經…感我佛。」見《文物》1987.5，頁5。

⑤② 「後世末法逼迫時，…是因緣妙法當隱，唯除此塔。以一切如來神力所持之故。…若於佛形象中安置，及於一切窣堵波中安置此經者，…必定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此寶篋陀羅尼…是一切如來未來現在及已涅槃者全身舍利。」見《大正新修大藏經》1022A，卷19，頁711上-中。

⑤③ 諸多東南沿海經藏出土題記中的用語，如「結緣」、「永作人天見聞」等，都反映這種與佛陀建立個人關係的企圖。詳參附錄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大部分東南沿海舍利塔內所納經典均是以所其所應允的弘大世俗利益而著稱。㊹例如在東南沿海諸經藏中最為常見的《妙法蓮華經》便明言道如來滅後若有受持、讀誦、念修此經者，當恆受佛陀守護。㊺此外，瑞光寺塔Ⅰ號經藏以及浙江金華萬佛塔(1062)中瘞藏的《大隋求大陀羅尼》也道：「於後末法之時…如斯有情作利益故，大梵此大隨求陀羅尼，依法書寫，繫於臂上及在頸下，當知是人是一切如來之所加持。」㊻

供養主的題記更是明白記述其捨經入塔以積功德的願望(參見附錄三)。這些題記包含範圍廣泛，包括救地獄之苦、護國降災，或是往生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世界；其中又以往生極樂淨土的願望最為常見。在目前已知的出土例中逾半數提及「願生極樂國」或「願永生淨土」。例如：瑞光寺塔Ⅰ號舍利埋藏出土的一卷《妙法蓮華經》上便載明供養主永宗捨此經以期往生淨土極樂世界：「僧永宗舍《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所其福報，上報四恩，下資三有。若有瞻禮頂戴…同生極樂國。」㊼

黃啟江在其〈北宋時期江浙地區的彌陀信仰〉中已指出北宋時期的江浙地區在僧團、官吏和信眾的多方支持下，發展成為彌陀信仰的中心，並且持續至南宋時期。㊽東南沿海舍利塔內出土物常有彌陀信仰有關的文物，便具體反映該信仰在江浙地區流行的程度。蘇州瑞光寺塔Ⅰ號舍利塔內藏經和浙江溫州白塔寺塔藏經分別與彌陀信仰的兩大主要經典伴出——《阿彌陀經》和《觀無量壽佛經》；㊾蘇州雲岩寺塔出土塔磚刻有「彌陀塔」字樣；㊿浙江黃巖靈石寺

㊹ 關於東南沿海經藏出土的經典名稱及數量，詳參附錄四。

㊺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262，卷9，頁61-62。雖然《妙法蓮華經》與在該區發源並發展的天台宗關係密切，但在目前已知的這些東南沿海經藏中，尚未發現與天台宗活動直接相關的證據。因此本文暫不對二者間的關連作進一步推測。

㊻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1153，卷20，頁620下。

㊼ 「天禧元年九月初五日，雍熙寺僧永宗轉舍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入新建多寶佛塔相輪珠內。所其福報，上報四恩，下資三有。若有瞻禮頂戴□舍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見《文物》1979.11，頁23。

㊽ 見黃啟江，〈北宋時期兩浙的彌陀信仰〉，《故宮學術季刊》卷14，1期(1996,秋季)，頁1-38。

㊾ 參附錄四。

㊿ 由此可見雲岩寺塔在北宋初期建塔之時，極可能與彌陀信仰有某種關連。見《文物》1957.11，頁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塔藏經也伴出一尊陶制阿彌陀佛像，[61]都反映往生彌陀淨土的思想在該地區流行的情況。

此外，阿彌陀佛的脅侍菩薩——觀世音菩薩——在若干東南沿海地區的舍利埋藏中也與佛教經典共出，證明彌陀信仰流行的程度：蘇州雲岩寺塔出土至少兩尊觀音銅像；瑞光寺塔Ⅰ號埋藏包含有一尊泥塑觀音；浙江金華萬佛塔(1062)發現兩尊銅製觀音坐像；而溫州白塔寺塔Ⅱ號埋藏(1115)則有兩尊泥塑觀音(參圖 11)和一尊青瓷觀音坐像。又，本地區還發現不少與觀音信仰有關的經典。在已知的九處藏經中便有五處包含有觀音信仰的最根本佛典——〈觀世音菩薩普門品〉；[62]而浙江瑞安仙岩寺塔(1043)則出土闡揚觀音信仰及其福報的《大悲心陀羅尼經》。[63]

「除地獄之苦」的願望在東南沿海經藏中也十分常見，並且和往生淨土的思想密切相關。浙江黃巖靈石寺塔藏經中(1067)包括一卷紙本《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64]該經敘述人死後將經過地獄十王的重重拷問和審核，才能決定往生何處；它同時也提供人們救贖的機會，鼓勵人們在生前以傳抄念誦《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的方式為死後預修功德。該經讚文道預修功德者能夠：「富貴壽延長」、「善神恆守護」、「免其一切苦楚」、「送出地獄」、「往生豪貴家」、「往生天道」、「天王恆引接，菩薩捧花迎，隨心往淨土」。[65]想必奉納此經的供養主也是懷著滅除地獄之苦甚而往生西方淨土的深切期望，而將此卷《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捨入靈石寺塔。這種為個人及其家人免除地獄之苦的急切願望，普遍見於東南沿海經藏的題記中。格式化的用語如：「為亡妣造塔永充供養」、「滅

---

[61] 見《東南文化》1991.5，圖版 1:6。

[62] 參見附錄四。另參《大正新修大藏經》262，卷 8，頁 56 下-58 中。

[63] 參見附錄四。另參《大正新修大藏經》1064，卷 20，頁 115 中-119 下。

[64] 該本《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為目前已知極少數《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寫本。該經本為紙本墨書並有線繪插畫。根據 Stephen Teiser 的研究，《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極可能是九世紀時中國所造經典，而在十世紀初大為流行。參 Stephen Teiser,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 1 及 Stephen Teiser,'The Growth of Purgatory'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Peter N. Gregory edts.,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 130.

[65] 見《東南文化》1991.5，頁 260-2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罪治病」、「追薦亡母超生」、「為亡考舍錢裝一身像」等處處可見。⑯在某些經藏中甚至還供納誓願救眾生於地獄之苦的地藏菩薩來進一步加強「除地獄之苦」的效力。⑰

由此看來，儘管少數個案中曾出現於末法之世傳播佛法的決心，⑱大多數江浙地區的經藏是在當地人們為求個人福報與解脫的前提下建立的。經卷作為供品項目之一，被人們捨入佛塔以換取佛陀的福蔭。它們負有傳達供養主的祈求的功能，並且被用以交換對等的利益。既然如此，供納品的「安全」和「隱密」便成為這些經藏最要緊的功能。唯有保存這些供納品安全、隱密和完好，方能確保供養主們的努力為佛陀所見；也唯有如此，供養主們的願望才有可能實現。因此，「將供納品存放在安全的地方」變得和「保存佛教經典於耐用材質上」一樣重要。因此，就安全性與隱密性而言，建立在塔身中心柱內的舍利埋藏實為一極佳的儲藏空間，因為這些中空的中心柱內相對寬敞的空間可以容納數量可觀的物品，並且也不易被發現。無怪乎附錄四中所見的九處江浙地區藏經中便有七處是建構在佛塔空心的中心柱內。

此外，供養主的社會階層也說明東南沿海地區經藏建構在佛塔中心柱內的實際需要。這些經藏出土的諸多題記顯示，供養主的成員多數是沒有官銜的一般信眾或是寺院中的低階層僧尼。因此，舍利塔與其塔內經藏的建立，實是提供給廣大中低階層信眾與僧尼獻納禮品、進而與佛陀建立「個人關係」的機會，因此建立一個空間寬大且安全的「儲藏庫」就變得極為重要。

遼與江浙地區經藏所見的東北亞與中國東南沿海交流關係

接下來要討論的是遼與北宋江浙地區和日、韓舍利埋藏間的相似性及其所反映的交流關係。這些地區的舍利埋藏在許多方面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例如：對某些特定經典的共同偏好、使用金屬版書寫經文、筒形和屋宇形舍利函的形

---

⑯ 詳見附錄三。

⑰ 例如蘇州瑞光寺塔Ⅰ號舍利埋藏(1017)和浙江金華萬佛塔(1062)的兩尊青銅地藏菩薩像。見《文物》1979.11，頁24，頁30，圖20；《文物》1957.5，頁42；頁44，圖6。另參《地藏菩薩本願經》，《大正新修大藏經》412，卷13，頁777下-790上。

⑱ 例如浙江黃巖靈石寺舍利埋藏出土的一段題記言及來世為僧以弘揚佛法的決心：「今生為寺主，來世作僧王，文章成七步，佛法播諸方。」見《東南文化》1991.5，頁2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式、舍利埋藏多設置在佛塔地上建築內，以及對末法來臨的憂慮。以下的討論將指出遼代的法舍利埋藏與東北亞的舍利埋藏傳統有極密切的關係，而與北宋中原地區舍利埋藏在性質上有根本的差異。同時還將以中國東部沿海的考古材料歸納指出北宋時期東南沿海與遼以及日韓經由海路交通進行著密切的往來。

一、在塔身或塔剎內供養經典以及對特定經典的特殊信仰

考古資料顯示遼的近鄰——高麗(918-1392)建塔供奉佛教經典的傳統由來已久。目前已知之年代最早的例子是益山帝釋寺(約建於 600-640)木塔塔基出土的銅版刻《金剛經》。此外，高麗人和遼人一樣也供奉〈法身偈〉；瑞山普願寺石塔(十世紀)塔身出土的一件舍利函上便刻有〈法身偈〉。[69] Jan Fontein 曾為文指出建塔供奉佛教經典是朝鮮半島佛教有別於東亞其它國家的特色；他還指出該地區經由海上交通引入印度的〈法身偈〉，因而與印度、東南亞佛教有一定的淵源。[70] 儘管唐僧義淨(635-713)所著《南海寄歸內法傳》即已提及並倡導建塔或造像以供養〈法身偈〉，但是在目前已發掘的唐宋舍利塔內幾乎不見〈法身偈〉。[71] 因此，遼代建法舍利塔供奉〈法身偈〉的風氣似不可能來自中國，而更可能是受其近鄰高麗佛教文化的影響。

其次，為數不少的八至十世紀朝鮮半島舍利埋藏均發現有《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這一對《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的特殊信仰又將朝鮮半島舍利埋藏與遼代法舍利塔進一步連繫。目前已知最早的韓國紀年例是慶州佛國寺釋迦塔(751)內供奉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事實上，《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的名

---

[69] 參 Jan Fontein, '*Sarîra* Reliquary from Pagoda of Powôn-sa Temple Site' (in Korean and English), *Misul Charyo* 美術資料，47 (June, 1991), p. 104; p. 97, fig. 7.

[70] 參 Jan Fontein, 'Relics and Reliquaries, Texts and Artefacts' in K.R. van Kooij and H. van der Veere *et al.*, *Function and Meaning in Buddhist Art: Proceeding of a Seminar at Leiden University, 21-24 October 1991* (Groningen: Egbert Forsten, 1995), pp. 26-27.

[71] 目前所知北宋黃河及淮河流域唯一出現〈法身偈〉的一處舍利埋藏是河南鄧州福勝寺塔地宮(1032)。該遺址出土的〈法身偈〉刻寫在供養佛牙及佛骨的銀槨前端，但是其文字內容與原經文有所不同：「諸法從因生，如來說是因；彼法從緣滅，大沙門所說。」這個差異反映時人對〈法身偈〉的真義並不瞭解，所以將〈法身偈〉中「因緣皆盡便入涅槃」的原意曲解為「萬事諸法隨因緣起落不絕」。見《文物》1991.6，頁 43-44; 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字在年代更早的舍利埋藏中已經出現；例如慶州皇龍寺塔基(約 645)出土的舍利函和皇福寺三層石塔(706)第二層出土的舍利函上刻寫的題記均提及《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⑫ 在供奉有《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的諸韓國佛塔中，有若干同時供奉九十九座小塔。這「九十九座小塔」是依照《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的指示所造，進一步說明這些韓國佛塔與《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的密切關係。⑬

另一方面， 在遼代法舍利塔也可見到對《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的特殊信仰，從而反映遼代法舍利塔的建置與高麗佛教文化傳統的密切關連。如前所述，

---

⑫ 此外，在佛國寺釋迦塔二層塔身、西洞里東石塔一層塔身(九世紀)、海印寺妙吉祥塔(895)、公州東院里石塔初層(十世紀)等處均發現《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詳參國立中央博物館《佛舍利莊嚴》(漢城，1991)，頁 160-174，224-230。

⑬ Jan Fontein 指出朝鮮佛教藝術與中、日有別而獨具特色的是其製造小塔往往以「九十九」為數。他並指出此一對九十九這一數字的特殊喜好，係源於不空(705-774)所譯的一部陀羅尼經，但是他並未指名究竟是何經典。參前引 Jan Fontein, 'Relics and Reliquaries, Texts and Artefacts', p. 26. 在此，筆者認為此一對九十九這一數字的特殊喜好極可能與《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密切相關。因為此經多處出現數字「九十九」，並以之喻無量無盡。此外，《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還勸人造九十九座小塔供養《無垢淨光大陀羅尼》。見《大正新修大藏經》1024，卷 19，頁 720 下。事實上學界曾提出「九十九座小塔的作法來自《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而該一傳統起源自新羅(西元前 57 年－西元 668 年)並且在朝鮮半島普遍流行」的看法。參 Ahn Key-hyôn, 'Buddhism in the Unified Silla Period' in Lewis R. Lancaster and C.S. Yu. edts.,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 in Korea: Religious Matur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Silla Dynasty* (Berkeley: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91), p. 28。此外，慶州皇龍寺址出土之殿宇型舍利函上的題記(873 紀年)已確認供養「九十九座小塔」的作法是依據《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而來。見國立中央博物館，前引書，頁 224, 239。又，奉化西洞里東三層石塔一層塔身(九世紀)和桐華寺金堂庵西塔初層塔身(九世紀)各出土九十九座小塔；佛國寺釋迦塔二層塔身(約 751)殘存十二座木製小塔；海印寺妙吉祥塔(895)出土一百五十七座小塔；禪林院石塔基壇下(十世紀)則有六十四座蠟製小塔。詳參國立中央博物館，前引書，頁 160-174。其中釋迦塔所出十二座木製小塔極可能與同塔所出之《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有關，因而可能是韓國供養九十九座小塔的早期實例之一。另參 Lothar Ledderose,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50, figs. 6, 11.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在遼代的慶州釋迦佛舍利塔的經藏(1049)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卷刻寫在銀版上的〈無垢淨光陀羅尼〉和《妙法蓮華經》一起安奉在相輪樑五室間的中室；在其他四室則尚有一百餘卷經本或刻、或印著《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中五大陀羅尼的〈相輪樑中陀羅尼〉與〈根本陀羅尼〉。遼代舍利埋藏對《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的特殊偏好還反映在遼塔的命名上。例如遼寧瀋陽發掘的兩座遼代舍利塔均名為「無垢淨光塔」；[74]《全遼文》中並有諸多例子說明以「無垢淨光塔」命名，在遼代是極為普遍的。[75]

《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中的「護國」思想可能是該經在兩地受到重視的原因之一。該經明言指出凡能造塔供養此經者，「於彼國土…常有一切諸天善神守護其國。」[76]這一護國思想與造塔的關係，在遼、韓的近鄰日本所造的「百萬塔」上最為明顯。日本孝謙天皇時期(749-758 與 764-770 在位)建造的「百萬塔」可能就是基於對《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護國功效的信仰所造。《續日本紀》卷三十孝謙天皇寶龜元年(770)四月條載，孝謙天皇敕造百萬小塔供奉《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以記其平定惠美押勝(卒於 764 年)之亂：「初天皇八年(764年)亂平，乃發弘願，令造三重小塔一百萬基。…露盤之下各置根本、慈心、相輪、六度等陀羅尼。」[77]

另一個在十至十一世紀普遍流行於中國東北、東南沿海和日本、朝鮮半島的佛經是《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寶篋印經》。本文稍早曾經提到，在遼慶州釋迦佛舍利塔出土的《佛形像中安置舍利記》即引用《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寶篋印經》。在韓國方面，該經典出現在許多十一世紀的高麗佛塔中，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平昌月精寺石塔塔身（十一世紀）發現的一卷雕印本《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

---

[74] 一是瀋陽市的無垢淨光塔(1044)，另一是瀋陽卓望山的無垢淨光塔(1045)。見《遼海文物學刊》1986.2，頁 47-48；頁 49，圖 23；頁 50，圖 24。另見《瀋陽市文物》(瀋陽，1993)，頁 165-167。

[75] 見陳述輯，《全遼文》，頁 109，117，162，247。

[76]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1024，卷 19，頁 718 下-719 上。

[77] 見藤原繼繩(727-796)等編，《續日本紀》卷三十，收入《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東京，1989-1998)，12-16 冊，頁 280-281。這些小塔在當時被分送至日本十所主要寺院，至今多數已散失或焚毀。幸而奈良法隆寺尚有逾四千座小塔保存完好。見奈良六大寺大觀刊行會編，《奈良六大寺大觀》(東京，1967-1973)，卷 4，頁 65-66，圖版 213-2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寶篋印經》(圖12)。[78]值得注意的是，該卷經本卷首所載年代係使用遼代的紀年——「統和二十五年」(1007)，[79]顯示高麗與遼代佛教文化的密切關係。[80]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寶篋印經》早在十世紀吳越國統治時期的中國江浙地區即已十分流行。吳越王錢俶(928-988)在九五五到九七五年短短二十年間，敕印大量《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寶篋印經》，並將其中部份印本裝藏於一種特殊的金屬製方形小塔內廣為散佈。這些小塔便是佛教史料所載之吳越王錢俶敕造的「八萬四千塔」(參圖13)。[81]考古資料證實這些小塔不只在吳越國境內廣為流佈，還跨越國界傳佈到敵對的中原地區，甚至越洋到達日本以及高麗。[82]

---

[78] 另外尚存兩卷雕印本：一卷發現在京畿道出土的一件舍利函內，另一則在私人收藏中。詳參國立中央博物館，前引書，頁231-232。

[79] 「統和」(983-1011)年號是遼聖宗(983-1031在位)的第一個年號。

[80] 事實上，在東北亞地區普遍流行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也出現在東南沿海，如蘇州瑞光寺塔I號埋藏(1017)即是一例；而大量流行於江浙地區的《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則在內蒙古巴林右旗的遼代釋迦佛舍利塔出土的《佛形象中安置舍利記》中被引用，反映東北亞與東南沿海地區交流實相。

[81] 《佛祖統記》卷四十三建隆元年(960)十月條載：「吳越王錢俶…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銅精鋼造八萬四千塔，中藏寶篋印心咒經，布散部內。凡十年而訖功。」見《大正新修大藏經》2035，卷49，頁394下。紀年考古材料顯示，這一造塔計畫延續遠超過十年。它至遲自955年已經開始，並且到975年仍在繼續。例如：若干紀年956年的經本在浙江湖州天寧寺石塔發現。見張秀民，〈五代吳越國的印刷〉，《文物》1978.12，頁74。另有一卷同是956紀年的經本出土於安徽無為塔塔基舍利埋藏。見《文物》1972.1，頁77-78。此外，紀年975年的經本還在浙江杭州雷峰塔出土。見張秀民，前引文，頁74-75。關於錢俶造八萬四千塔之研究，參關根俊一，〈錢弘俶八萬四千塔について〉，*MUSEUM*, 441 (1987)，頁12-20。

[82] 河北定州北宋靜志寺塔地宮(977)和河南鄧州北宋福勝寺塔地宮(1032)便各出土一件。見出光美術館編，《地下宮殿の遺寶》(東京，1997)，圖4。另見《文物》1991.6，頁41，圖7；頁45；頁46，圖20。史料記載吳越王錢俶將所造八萬四千寶篋印塔中的五百塔賜贈日本：「有西竺僧日轉智…走南海諸國至日本。適吳越忠懿王用五金鑄十萬塔，以五百遣使者頒賜日本。使者還，智附舶歸。」引自關根俊一，前引文，頁12。關於日韓現存的錢俶將所造寶篋印塔，參關根俊一，前引文，頁12-13；梅原末治，〈吳越王錢弘俶八萬四千塔〉，《考古美術》，81 (1967)，頁2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江浙地區與日本均普遍流行的《妙法蓮華經》更進一步凸顯江浙地區與日本的關係。如前所述，《妙法蓮華經》是江浙地區經藏中最常見的經典；而該經同時也普見於十一、十二世紀日本「經塚」中。考古資料顯示，大部份的日本經塚均埋藏有《妙法蓮華經》；而在多數經塚中，《妙法蓮華經》的數量皆明顯超越其他經典。學者們還指出這些埋藏有《妙法蓮華經》的經塚地點多半正是當時《妙法蓮華經》信仰流行的地區，從而確立《妙法蓮華經》與日本經塚間的關係。㉝

二、末法來臨的時點

遼塔經藏與日本經塚還有一個極重要的相似之處——兩地均認為「末法」將於一〇五二年來臨。如前所述，雖然在中國唐代後期已有提出一〇五二年為「末法」來臨日的基礎，但此一末法觀似乎未在北宋普遍流行，反在遼代法舍利埋藏中出現。在日本方面，平安時代(784-1185)初期雖曾出現幾種對末法來臨時點不同的看法，但文獻資料顯示至遲在九世紀時，「一〇五二年末法到來」的看法已被提出。㉞《扶桑略記》永承七年(1052)正月條：「今年始入末法」，證實時人認為永承七年（即一〇五二年）開始進入末法時期。㉟

㉝ 許多學者均論及日本經塚與《法華經》信仰的關係。例如：關根大仙，《埋納經の研究》(東京，1968)，頁 25-40；三宅敏之，〈經塚の遺物〉，收入《新版仏教考古學講座 6:經典、經塚》(東京，1977)，頁 81-83，89-90，92-96；京都國立博物館編，《京都國立博物館藏經塚遺寶》(京都，1986)，頁 131；關秀夫，《經塚とその遺物》，《日本の美術》292 (September, 1990)，頁 26-31。

㉞ Michele Marra 曾為文詳論日本末法思想的發展。他認為：基於「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而佛陀入滅於西元前 949 年」的信仰，日本在平安時代初期已存在「末法始於 552 年」的看法。然而 Michele Marra 認為九世紀的日本人似乎難以接受此一來自中國的想法，而將之以模糊的用語—「末世」涵蓋。同時，日僧玄叡(活動於 840 年)堅持「正法千年、像法千年」的看法，從而將末法來臨之日自 552 年延後到 1052 年。參 Michele Marra, 'The development of *mappô* thought in Japan' , *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15.1 (1998), pp. 39-40。

㉟ 參皇円(卒於 1169 年)編，《扶桑略記》卷二十九，《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1965)，卷 12，頁 2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考古資料顯示，從十世紀後半起，日本人同遼代人一樣建立了許多「經塚」埋藏經典，以備末法來臨，至今在日本各處已發現逾千座經塚遺址。[86] 這些經塚出土的題記明言它們是建來存經以待彌勒佛降生說法，[87] 奈良金峰山出土金銅經筒(1007 紀年)題記便是一例。[88] 值得注意的是，該題記後段還說明這金峰山經塚不只是造來存經以備法滅，而且還是用來供養釋迦牟尼佛法舍利之用：「埋法身之舍利，仰釋尊之哀愍」，[89] 由此可見其與遼代法舍利塔性質相似之處。

三、用金屬和其它耐久材料刻寫經文

遼、日、韓經藏還存在一項特殊的共同點：使用耐用材質刻寫經典，以便長久保存經典。韓國益山帝釋寺木塔塔基(約 600-640)出土銅版《金剛經》；[90] 王宮里塔址出土金版《金剛經》(圖 14)；[91] 在遼代方面，遼寧朝陽延昌寺塔天宮(1043)出土一卷由七片銀版組成的經卷，卷上刻有《波羅蜜多心經》和諸陀羅尼(圖 15)；[92] 內蒙巴林右旗釋迦佛舍利塔所出〈功能法〉、〈相輪樘中陀羅尼

---

[86] 關於日本經塚概論，參三宅敏之，〈經塚の分佈〉，收入《新版仏教考古學講座 6:經典、經塚》(東京，1977)，頁 183-193；同氏，〈經塚遺物年表〉，收入同書，頁 212-240；京都國立博物館編，前引書；關秀夫，前引書。

[87] 參石田茂作，〈總說〉，《新版仏教考古學講座 6:經典、經塚》(東京，1977)，頁 2；京都國立博物館編，前引書，頁 131；關秀夫，前引書，頁 31-37；關根大仙，前引書，頁 9-60；奥村秀雄，〈埋經と往生思想〉，*MUSEUM*，223 (October, 1969)，頁 26-34。

[88] 參石田茂作、矢島恭介，《金峰山經塚遺物の研究》，帝室博物館學報第八(東京，1979 年重印 1973 年版)，頁 23-25，圖版 6, 7，頁 45-71；保坂三郎，〈經塚概論〉，收入《新版傳教考古學講座 6:經典、經塚》(東京，1977)，頁 45-54。

[89] 題記內容參見關秀夫，前引書，頁 19。

[90] 見國立中央博物館，前引書，圖版 2，頁 169。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早期即有以金屬或陶土等耐用材質書寫〈法身偈〉的例子，Jan Fontein 並據此提出這一習慣經由海路傳入朝鮮半島的看法。見前引 Jan Fontein, '*Sarîra* Reliquary from pagoda of Powôn-sa Temple Site', p. 27。因此此處所引韓國作例有可能便是源自於印度。

[91] 見國立中央博物館，前引書，頁 170。

[92] 見《文物》1992.7，頁 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咒〉、〈無垢淨光陀羅尼咒〉也刻寫在金版和銀版上。[93]此外，若干日本經塚也發現金屬刻經，其中已知年代最早的是奈良金峰山經塚(1007)所出銅經版。[94]金屬刻經未見於中國其他地區。唐代段成式(卒於863年)在其《酉陽雜俎》中便提到他個人所見的一件黃金牒經，並認為其非中國所製：「寺…有嵌七寶字《多心經》小屏風。盛以寶函。…屏風十五牒，三十行經…。黃金牒經，善繼疑外國物。」[95]

除了金屬之外，日韓地區經藏還出現將經典書寫在陶器和石頭上的例子。在日本，已有逾二十個經塚發現「瓦經」和「石經」，其中有紀年者最早可至一〇七一年。[96]若干韓國經藏也發現有在陶版和石版刻寫建塔原委的例子。[97]在中國方面，至遲於九世紀在浙江地區即已出現在陶瓷器上書寫文字記事的作法。一件早期的例子是浙江餘姚出土的帶蓋青瓷罐，罐身刻寫有二百九十字墓誌(842 紀年)。[98]江浙地區長期以來經由海路與日本有密切來往，因此浙江地區青瓷墓誌罐與日本經塚的「瓦經」之間的關連，值得日後注意。

四、經筒形制

日本學者河田貞曾指出「屋宇形」舍利函是朝鮮地區在七世紀或稍早發展

---

[93] 見《文物》1994.12，頁19；頁14，圖31。

[94] 見石田茂作、矢島恭介，前引書，頁31-33，圖版25-29。

[95] 見《酉陽雜俎》卷五，一五二條(北京，1981)，頁249。引文中所指之《多心經》應是玄奘(602-664)所譯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簡稱。參《大正新修大藏經》251，卷8，頁848上-下。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記》中曾提及印度迦膩色迦王命造銅版刻經，並將之供養在佛塔內。參 Samuel Beal, *Si-yu-ki, Buddhist Record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Trubuer & Co., 1984), vol. 1, pp. 152-156. 但是印度這一金屬版刻經的習俗似乎並未因此而為中國人所採用，從而在段成式所處的晚唐時代仍被認為是奇異的「外國物」。

[96] 關於日本「瓦經」和「石經」的遺址，參三宅敏之，前引〈經塚の遺物〉，頁71-79。鳥取縣大日寺發現的瓦經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日本瓦經。參前引文，頁84。

[97] 例如法光寺石塔(828)與寶林寺東西塔(870)出土的石版，以及海印寺吉祥塔(895)所出記載建塔原委的磚版。參國立中央博物，前引書，頁170。

[98] 見《文物》1997.10，頁83-84。該誌文內容明言此一墓誌將成不朽：「志雖不朽，終成古丘。」又，《中國陶瓷全集：4 越窯》(上海，1981)尚有諸多類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來的極具地區特色的舍利函形式。[99]韓國慶北漆谷郡松林寺石塔(八世紀)第二層發現的黃金亭閣式舍利盒即為一例(圖16)。[100]此外，慶州皇龍寺塔(645)、佛國寺釋迦塔(751)、光州西塔(十世紀)，以及安東臨河寺磚塔址(十世紀)等均出土屋宇亭閣形舍利函。[101]

在唐宋中國(除江浙地區以外)方面，除極少數例子之外，[102]絕大多數舍利函均作盝頂方盒狀，或作前高後低、帶券形蓋的棺槨形狀。然而在東北的遼代舍利塔中卻曾發現若干屋宇形舍利函，例如內蒙寧城出土石舍利函則作殿堂形式(1045)；而遼寧朝陽延昌寺塔天宮(1043)出土的黃金舍利盒則作方形四披頂房屋狀(圖17)，其四隅並裝飾串珠、盒座以大塊金屬蓮瓣鑲邊等等均與韓國舍利函甚為相似。[103]

在遼代及日本還常見一種藏經用的帶塔剎形蓋、蓮瓣座的圓筒形舍利函。這種經筒在遼寧朝陽延昌寺塔天宮(1043)（參圖18)和內蒙巴林右旗釋迦佛舍利塔(1049)均有出現，尤其在後者更高達百餘件(參圖3)，為該塔最主要的經筒形式。這種型式的舍利函在中國中原地區極為少見，[104]但普見於十一至十三世紀的日本經塚中，且多數是陶瓷製品。[105]陶瓷史方面的研究已經指出，日本

---

[99] 見河田貞，〈インド、中國、朝鮮の仏舍利莊嚴〉，收入奈良國立博物館編，《佛舍利の莊嚴》(京都，1983)，頁270。

[100] 該舍利盒載一玻璃碗，碗內置一玻璃長頸瓶以安奉舍利子。見國立中央博物館，前引書，圖版7。

[101] 見國立中央博物館，前引書，圖版4，8，31，39。

[102] 陝西扶風唐代法門寺地宮出土之大理石彩繪靈帳即屬「屋宇形」舍利函。該函出土於地宮中差，並有景龍二年(708)紀年。見《文物》1988.10，頁7。

[103] 見《考古》1964.11，頁564；圖版20:8，20:9。韓國類例可見於佛國寺釋迦塔(751)金銅方形透雕舍利函、傳南原出土舍利函(八世紀後半－八世紀末)、安東臨河寺磚塔(九世紀末－十世紀前半)銀鍍金舍利函、光州西塔(十世紀初)鎏金銅殿閣形舍利函等。國立中央博物館，前引書，頁31，45，63，68，69。

[104] 陝西白水妙覺寺塔塔基發現的一座銀舍利盒與此型相近，並有天聖二年(1023)紀年。但這一銀盒為中原地區目前已知的孤例。妙覺寺塔的發掘報告尚未發表，但此銀舍利盒於一九九八年九月筆者參觀西安碑林博物館時在該館展出。

[105] 例如福岡四王寺山經塚(十二世紀)出土的白瓷經筒即是典型的例子。見《世界陶瓷全集：宋》(東京，1977)，圖版276。該經筒筒蓋作寶珠塔剎狀，底部則飾浮彫蓮瓣，與內蒙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塚所出陶瓷經筒極大多數係產自中國的浙江、福建和江西等地區，⑯從而再度證實當時存在於江浙地區與東北亞間的連絡網路。⑰

除上述幾點之外，浙江金華萬佛塔在塔基下的舍利埋藏室中供奉石經幢的作法(1062)，⑱與河北順義遼淨光塔(1013)和遼寧朝陽延昌寺塔地宮(1044)一致，⑲也反映了兩地佛教文化交流的景況。

餘論

遼寧朝陽延昌寺塔的題記資料揭示史料未載的遼代末法觀，無疑是研究遼代佛教文化極重要的一筆材料。而內蒙巴林右旗釋迦佛舍利塔出土的眾多法舍利，又進一步開拓學界對遼代舍利埋藏的理解。以上論述以對這兩個遺址的分析作為起點，探討遼代法舍利塔與中國東南沿海舍利塔藏經的異同，進而將二者納入東北亞與中國東南沿海交流的廣大脈絡中思考，指出遼代佛教物質文化與東北亞文化的密切關連，以及東北亞地區與中國江浙地區經由海路所進行的交流。

江浙地區雖然隸屬於北宋，但其利用佛塔中心柱瘞藏舍利、供養品種類包括經典、佛像，卻獨不見以文字或圖像表現釋迦入滅等等，都反映其與北宋黃淮流域地區舍利埋藏間的極大差別，從而令人意識到北宋佛教文化中的區域文化差異，值得將來繼續留意。

十世紀的特殊政治局勢極可能是促成東南沿海獨特的區域文化發展，並且與東北亞積極交流的一項重要因素。為避免遼朝協助敵對的南唐，吳越國

林右旗釋迦佛舍利塔所出木雕彩繪法舍利塔極為相似。見《文物》1994.12，頁10，圖16；頁11，圖17:1；頁12，圖18,19；彩版2,3。另參《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東京，1978)，圖版30及其它諸多類例。另參三宅敏之，前引〈經塚の遺物〉，頁98-124。

⑯ 參矢部良明，〈日本出土の唐宋時代陶磁〉，《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東京，1978)，頁116-120。

⑰ 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一件鎏金銅經筒據稱原係來自山西五臺山咸通寺。該經筒筒身刻有一日僧題記(紀年925年)，反映日本埋經的習俗有可能透過如經筒一類的物品而為宋遼邊界地區人民所知。

⑱ 見《文物》1957.7，頁41。

⑲ 見《文物》1964.8，頁49；《文物》1992.7，頁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907-978)積極拉攏遼國，甚至連年進貢遼國示好(參附錄五)。⑩除了因外交目的進行的朝貢貿易，吳越國的富饒物產也吸引遼與吳越兩地的商人積極發展兩地間的海上貿易，⑪因此十世紀以降兩地間的貿易持續繁榮。史料記載顯示自唐代後半期開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便與日、韓建立起密切的海上連繫網絡。在五代吳越國建立之前，東南沿海地區即透過入華留學或朝聖的日、韓僧侶而與東北亞地區有所接觸。到了五代吳越國時期，在錢氏家族的倡導下，該地佛教蓬勃發展，成為天台宗信仰的中心，吸引許多日韓留學僧侶前來學習或遊歷；⑫而吳越國的僧侶也曾前往日韓傳法或取經。⑬由於考古材料的限制——特別是江南地區因氣候因素造成考古材料保存的困難，使得唐宋時期東南沿海與遼、日、韓間關係的進一步確立尚有困難，但是由舍利塔藏經所見兩地的交流關係，或可作為日後研究的一個開端。

（責任編輯：邱琳婷）

---

⑩ 參附錄五。

⑪ 關於遼與吳越間的交流關係，參日野開三郎，〈五代時代における契丹と支那との海上貿易〉，《史學雜誌》，52.7 (1941)，頁55-82；Edmund H. Worthy, 'Diplomacy for Survival: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Wu Yueh' in Morris Rossabi edt.,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a nd Its Neighbours, 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17-44, especially pp. 36-37.

⑫ 見吳任臣(約1628-1689)，《十國春秋》(北京，1983)，卷89，頁4右，7右。

⑬ 經歷黃巢之亂(875-884)及後續戰亂，吳越地區所存經典多所逸失，於是吳越國皇室乃積極向日韓求經。見《本朝文粹》，收入《大日本史》(東京，1928-1929)，卷7，頁24-25。志磐(1220-1275)，《佛祖統記》，《大正新修大藏經》2035，卷49，頁206上-中，294下-295上，391下。另見吳任臣，前引書，卷89，頁5中-6上。參Edmund H. Worthy, *ibid.*, p. 36; David W. Chappel edt., *T'ien-T'ai Buddhism: An Outline of the Fourfold Teachings by Korean Monk Chegqan* (Tokyo: Daiichi-shobô, 1983), pp. 25-30。日野開三郎，〈唐五代東亞諸國民海上發展と仏教〉，收入同氏，《北東アジア國際交流史の研究：上》，東洋史學論集。卷九(東京，1984)，頁188-229。(原發表於1962和1964年)，特別是頁206-229。關於吳越國的佛教，參Edmund H. Worthy, *ibid.*, p. 36; 安藤智信，〈吳越武肅王錢鏐と仏教－神秘への傾向性と王侯の野望〉，《大谷學報》50.4 (1971)，頁28-46；Angela F. Howard, 'Royal patronage of Buddhist art in tenth century Wu Yueh',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57 (1985), pp. 1-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一

出土遼代舍利埋藏一覽表

編號	遺址名	位置	地點	年代	舍利類型	出處
1	北鄭村塔 I	塔身	河北房山	938	經幢	《考古》1980.2
2	冶仙寺塔	塔基	河北密雲	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	經卷？	《文物》1994.2
3	淨光寺塔	塔基	河北順義	1013	舍利子，經幢	《文物》1964.8
4	延昌寺塔 I	塔剎	遼寧朝陽	1043	舍利子，陀羅尼	《文物》1992.7；《遼海文物學刊》 1990.2
5	延昌寺塔 II	塔基	遼寧朝陽	1044	舍利子？，經幢	《文物》1992.7;《遼海文物學刊》1990.2
6	無垢淨光塔 I	塔基	遼寧瀋陽	1044	舍利子	《遼海文物學刊》1986.2
7	無垢淨光塔	塔基	遼寧瀋陽卓望山	1045	舍利子？	《遼海文物學刊》1982. 3；《瀋陽市文物志》(瀋陽，1993)，頁165167.
8	寧城塔	塔基	內蒙寧城	1045	舍利子	《考古》1964.11
9	釋迦佛舍利塔	塔剎	內蒙巴林右旗	1049	舍利子，陀羅尼，經本	《文物》1994.12
10	北鄭村塔 II	塔基	河北房山	1051	舍利子，經幢	《考古》1980.2
11	獨樂寺塔	塔剎	河北薊縣	1058	舍利子	《考古學報》1989.1
12	天宮寺塔	塔身	河北豐潤	1062	經本	《文物春秋》1
13	時家寨淨居院塔	塔基	遼寧瀋陽	1074	舍利子，〈法身偈〉	《瀋陽市文物志》(瀋陽，1993)，頁 167-1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碑	
14	興城塔	?	遼寧興城	1092	?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1979），頁 96.
15	萬金塔	塔基	吉林農安	十一世紀	舍利子	《文物》1973.8
16	釋迦佛升天舍利塔 I	塔基	遼寧瀋陽	I107	舍利子	《文物》1957.8;《考古》1957.6;《瀋陽市文物志》(瀋陽，1993)，頁 169-170.
17	釋迦佛升天舍利塔 II	塔剎	遼寧瀋陽	1108	舍利子	《文物》1957.8;《考古》1957.6;《瀋陽市文物志》(瀋陽，1993)，頁 169-170.
18	淨覺寺	塔基	河北易縣	1115	舍利子，陀羅尼	《文物》1986.9
19	壓經塔	塔基	河北房山	1118	石經版	《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北京，1986)，頁 121
20	大良村塔	塔基	河北武清	十一世紀	經本?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1979），頁 49
21	遼塔營子	塔基	遼寧阜新	十一至十二世紀初	舍利子	《東北文化：白山黑水中的農牧文明》（香港，1996），圖版 210,214，215.
22	釋迦塔	佛像內	山西應縣	十二世紀初	經本	《文物》1982.6；《應縣木塔遼代秘藏》(北京，1991)；《應縣木塔》(北京，19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二

出土北宋舍利埋藏一覽表

編號	遺址名	位置	地點	年代	藏經	出處
1	雲岩寺塔	塔身	江蘇蘇州	961	有	《文物》1957.11;《文物》1958.3
2	南市塔	塔身	浙江東陽	961		《考古》1985.1
3	開元寺塔	塔基	河南鄭州	976		《中原文物》1983.1
4	靜志寺塔	塔基	河北定州	977		《文物》1972.8;《地下宮殿の遺寶》(東京，1997).
5	清涼寺	佛像內	浙江台州	985	有	《日本彫刻史基礎資料集成：平安時代造像銘記篇一解說》(東京，1966).
6	淨眾院塔	塔基	河北定州	995		《文物》1972.8;《地下宮殿の遺寶》(東京，1997).
7	法海寺塔	塔基	河南密縣	999		《文物》1972.10
8	飛英塔	塔身	浙江湖州	十世紀後半	有	《文物》1994.2
9	靈台舍利函	塔基	甘肅靈台	十世紀		《文物》1983.2
10	句容舍利函	塔基	江蘇句容	十世紀後半至十一世紀		《考古》1985.2
11	長治 I 舍利函	塔基	山西長治	十世紀後半至十一世紀		《考古》1961.5
12	長治 II 舍利函	塔基	山西長治	十世紀後半至十一世紀		《考古》1961.5
13	莘縣塔	?	山東莘縣	十世紀後	有	《文物》1982.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半至十一世紀		
14	成都舍利函	塔基	四川成都	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		《考古與文物》1983.3
15	嵩岳寺塔 I	塔剎	河南登封	十世紀至十一世紀初		《文物》1992.1
16	嵩岳寺塔 II	塔剎	河南登封	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		《文物》1992.1
17	瑞光寺塔 I	塔身	江蘇蘇州	1017	有	《文物》1979.11
18	報恩寺塔	塔基	安徽壽縣	1026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 1979), 頁 237.
19	阿育王塔	塔身	江蘇連雲港	1026		《文物》1981.7;《佛教藝術》, 221 (July, 1995), 頁 42-54.
20	福勝寺塔	塔基	河南鄧州	1032		《文物》1991.6
21	無為塔	塔基	安徽無為	1036	有	《文物》1972.1
22	仙岩寺塔	塔身	浙江瑞安	1043	有	《文物》1973.1
23	開元寺塔	塔剎	陝西彬縣	1053		《文博》1990.2
24	大聖舍利塔	塔基	江西南豐	1058		《江西文物》1989.2
25	佛牙舍利寶塔	塔基	湖北當陽	1061		《文物》1996.10
26	萬佛塔	塔基	浙江金華	1062	有	《文物》1957.5;《金華萬佛塔出土文物》(北京, 1958).
27	郴縣塔	?	湖南郴縣	1063	有	《文物》1959.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8	靈石寺塔	塔身	浙江黃巖	1067	有	《東南文化》1991.5
29	妙道寺塔	塔基	山西臨猗	1069		《文物》1997.3
30	甘露寺塔	塔基	江蘇鎮江	1078		《考古》1961.6
31	釋迦舍利塔	塔基	山東長清	1098		《考古》1991.3;《文物》1983.6
32	瑞光寺塔II	塔身	江蘇蘇州	十一世紀初	有	《文物》1986.9
33	太倉塔	塔基	江蘇太倉	1111		《文物》1956.6
34	太子靈蹤塔	塔基	山東汶上	1112		《山東畫報》1994.7
35	白塔寺塔II	塔身	浙江溫州	1115	有	《文物》1987.5
36	少林寺塔	?	河南登封	1126		《中原文物》1985.2
37	興聖教寺塔 I	塔基	上海	十二世紀前半		《考古》1983.12
38	興聖教寺塔 II	佛像內	上海	十二世紀前半		《考古》1983.12
39	白塔寺塔I	?	浙江溫州	?		《文物》198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三

五代至北宋東南沿海藏經舍利塔內題記選錄

江蘇蘇州雲岩寺塔塔身（961）

●□信心造□□盛眾□金字法華經。

●建隆二年男弟子孫仁朗鏤，願生安樂國為僧。

●弟子顧超捨。願三世親生父母疾證菩提佛道。

●女弟子陸七娘敬舍大鏡一面，入武丘山塔上。保佑自身清吉□諸□□眷屬團圓身富清健□再□ 供養降建二年(961)三月日題。

●彌陀塔。

浙江湖州飛英塔塔身（十世紀後半）

●吳越太后捨經函入天台山廣福金文院轉輪經藏。

江蘇蘇州瑞光寺塔塔身Ⅰ(1017)

●瑞光院第三層塔內真珠舍利寶幢。

●寓跡僧子端，幸值諸上善人建第三層浮圖，安置諸佛聖賢遺身舍利寶幢，藏盒之次，特捨此木底，少貴載荷，永假緣結。雖漸多寶之大功，且效聚砂之少善，以茲迴向悉等。真所願者，生生世世興正法似馬鳴，興象法如龍樹。奉佛弘法度生利物。諸餘善簽咸同文殊、普賢諸大菩薩等。更願此生所誦法華、維摩、仁王、般若常不忘句逗，皆得如說修行矣。略題記耳。

●時顯德三年(956)歲次丙辰十二月十五日。弟子朱承惠特舍淨財，收讀此古舊損經七卷，備金銀及碧紙請人書寫，已得句義周圓，添續良因。伏願上報四重恩，下救三塗苦。法界含生，俱占利樂，永充供養。

●天禧元年(1017)九月初五日。雍熙寺僧永宗轉舍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入瑞光院新建多寶佛塔相輪珠內。所其福利，上報四恩，下資三有。若有瞻禮頂戴□舍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

●劍南西川成都府淨眾寺講經論持念賜紫義超，同募緣傳法沙門蘊仁…咸平四年(1001)十一月…。

●蘇州長州縣通賢鄉清信弟子顧彥超將亡婦在生衣物敬捨，鑄造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一所。伏用資荐亡妣胡氏五娘子，生界永充供養。歲次乙卯十月日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浙江瑞安仙岩寺塔塔身(1043)

●大宋國溫州仙岩寺釋迦遺教比丘靈旦，於景祐元年(1034)甲戌歲遇本寺傳教悅闍黎於寺前造寶塔一所，捨衣缽錢一貫二百文入緣造塔，兼自誦此陀羅尼經，共計五藏，恭為四恩三有法界含情。至慶曆三年(1043)癸未二月八日其塔造成，迎舍利經像入塔次。而靈旦謹發心請僧書寫此經，鎮藏塔中，永為不朽。

●試校書郎守縣尉柳珣為資荐先考秘丞，謹舍西天感應舍利二十顆入仙岩寺塔下，伏願仗此良因，永生淨土。珣卑情無任追慕哀切之至。大宋明道二年(1033)歲次癸酉十一月十五日題。

●…值師建造舍利寶塔甫畢，乃發至誠，刺身血繕寫普賢菩薩行願品經、金剛經、般若波羅蜜經共二卷…內於舍利塔中，永作人天見聞。

浙江金華萬佛塔塔基(1062)

●…舍此幢子一所，永鎮龍宮供養。嘉祐七年(1062)歲次壬寅十月二十八日。沙門靈壽書。

●女弟子□為四恩三有造地藏一身，永充供養。

浙江黃巖靈石寺塔塔身(1067)

●東面報先師和尚度脫之恩…今世預修來世善願祈福得雙通。塔南面報成宗…。西面報援僧錄奉薦制命之恩。北面報亡老妣袁三郎養育之恩。開寶八年(975)二月初二日，寺主經律大德嗣卿記。

●…特舍淨財，奉為四恩三有兼保自身，造石塔一所，永充供養。誦曰：「今世為寺主，千生願出家，佛地金園住，萬代掛袈裟。開寶三年(970)庚五歲二月日建。…」

●…舍錢結緣…。

●□僧紹記乙丑年期奉在為堂慈母造。

●寺主經律大德嗣卿記：「今生為寺主，來世作僧王，文章成七步，佛法播諸方。太平興國六年(981)十月。姓袁，其年七十。五十四在寺業家三十五省補飼主。太平興國六年十日月初五日記。

●南方毗樓勒叉天王。乾德四年(966)上元丙寅玖月十五日。勾當僧歸進募入塔永充供養。咸平元年(998)十一月廿四日重建此塔。僧紹光記。靈石寺。

●治平四年(1067)九月廿一日入吉利。當寺比丘思穆俗姓洪，父名保，娘姓鄭。第二娘本師瑞良、瑞岩。其年春教文十二價，冬教文十五價。恐人要布，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弟思穆治平願做僧，年三十二歲。兄師弟修寶塔舍衣缽。

- □比丘唯顯幸值重修寶塔，伏睹釋迦真身舍利寶塔□□枚。…治平四年(1067)丁未本命之歲，九月十六日號之也。
- 清信佛弟子王廷煦。右廷煦伏遇吳王病育分舍利於金園。僧敬几皈建浮圖於寶地。況以我佛真容雖隱，舍利不藏。接引沈迷、援救罪苦。但是廷煦有幸得生善獲，遇明時八方而盡…既遇真身現相，唯緣佛言一念之心，便果千生之善。但廷煦今則傾心發願，志意皈依，特濟世之財，入在塔龕，為信伏之乞釋迦化主舍利真身不舍慈悲，乞垂鑒懇。但廷煦惟願生生圓滿，世世崇榮；漸圓八地之功，早證四弘之覺。乾德肆年(966)上元歲次丙寅玖月拾五日。信佛弟子王廷煦發願記。
- …同舍淨財鑄造此塔相輪，並舍金盒、銀盒，各盛一舍利…有罪願消，有病療□，永祝富饒…咸平元年(998)十一月二十四日書記相輪。
- 治平四年(1067)九月初六日，當寺僧思照並童行元亮、元鑒等伏睹本寺寶塔建立年賒。但思照等同發志心勾當重新修善東西寶塔二所…仗此善緣，俱出苦輪、同生淨土…。
- 願吳越國王姓錢，代代萬歲。

浙江溫州白塔寺塔塔身II號(1115)

- 比丘子堅印造此經安置寶塔□，為眾生莊嚴無□□道，願早獲成就。時大觀三年(1109)三月十八日□□□。
- …日月無光…不忍見天下眾生落淮海中…信者得三分，見太平豐稔年。…若寫經，免一門災難。…寫此經…感我佛…崇寧二年(1103)五月□日，信奉佛弟子。
- 女弟子周二娘為亡考周卅六郎舍錢卅文裝一身像。
- 前資院主皆□唯湛施錢，建造阿育王寶塔□並蓋亭。
- 潘友軻並妻康百六娘、男易啟山默舍磚千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四

五代至北宋江浙地區舍利塔內藏經經名及數量一覽表

	飛英塔塔身	靈岩寺塔塔身	瑞光寺塔塔身 I	瑞光寺塔塔身 II	無為塔塔基	仙岩寺塔塔身	靈石寺塔塔身	萬佛塔塔基	白塔寺塔塔身 II
岩寺塔塔身妙法蓮華經	1	7	2			2			3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1	13		1	
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						1		1	
相輪檫中陀羅尼			106						
佛頂尊勝陀羅尼						1			
佛說阿彌陀經			1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2
大方廣佛華嚴經						2			
金光明最勝王經				1					4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10		1	
金剛經						1			
楞嚴經									1
大悲陀羅尼經大悲咒						12			1
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			1					1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									
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							1		
佛說天地八陽經			1						
其它陀羅尼			1		3				10

註：經典數量係據考古報告所載。其中單經的各章節若由不同供養主奉獻，則以章節數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五

吳越（907-978）進貢遼朝（907-1125）年表

年代	引文	出處
九一五年	吳越王錢鏐遣滕彥休來貢。	遼史，本紀一，頁 10.
九一六年	吳越王遣滕彥休來貢。	遼史，本紀一，頁 11.
九一八年	晉、吳越、渤海、高麗…各遣使來貢。	遼史，本紀一，頁 12.
九二〇年	吳越王復遣滕彥休貢犀角、珊瑚，授官以遣。	遼史，本紀二，頁 16.
九二三年	吳越王遣使來貢。	遼史，本紀二，頁 18.
九三二年	拽剌迪德使吳越還。吳越王遣使從，獻寶器。復遣使持幣往報之。	遼史，本紀三，頁 33.
九四〇年一月	吳越王遣使來貢。	遼史，本紀四，頁 47.
九四〇年九月	吳越王遣使來貢。	遼史，本紀四，頁 48.
九四一年八月	吳越王遣使奉蠟丸書。	遼史，本紀四，頁 50.
九四一年十月	吳越王遣使來貢。	遼史，本紀四，頁 50.
九四三年	吳越王遣使來貢。	遼史，本紀四，頁 53.

註：其他史料亦記載相同事項，在此不列其出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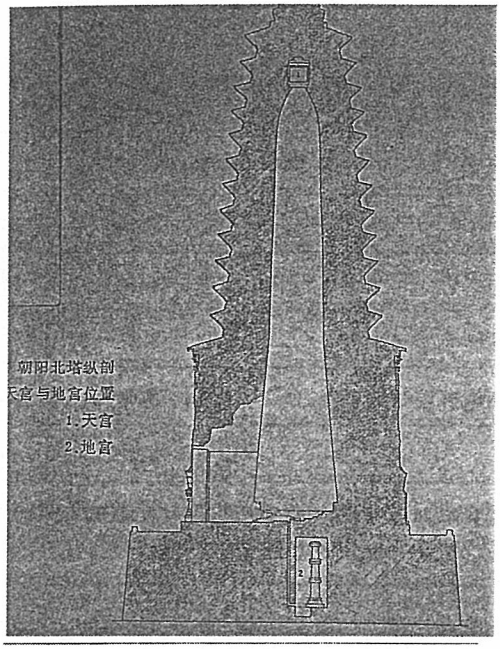


圖 1　延昌寺塔天宮、地宮舍利埋藏分佈圖
遼寧朝陽北塔《文物》1992. 7, 頁 1, 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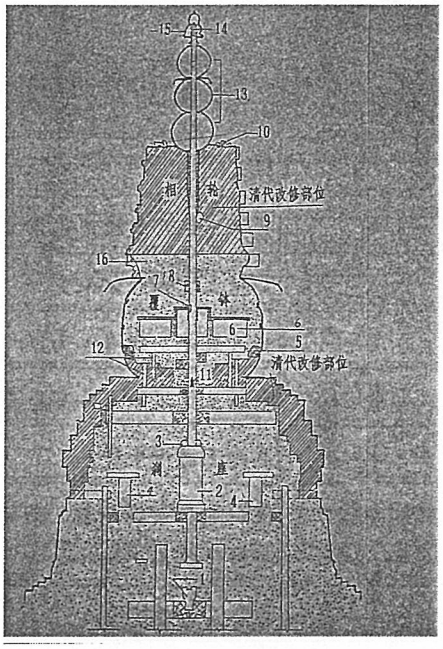


圖 2a.　釋迦佛舍利塔天宮舍利埋藏位置及平面圖內蒙古巴林右旗白塔《文物》1994. 12, 頁 7, 圖 6; 頁 9, 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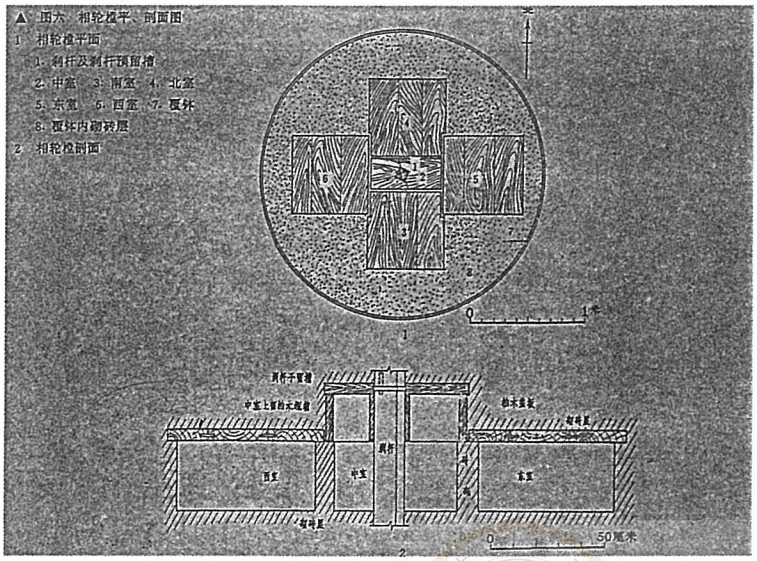


圖 2b.　釋迦佛舍利塔天宮舍利埋藏位置及平面圖內蒙古巴林右旗白塔《文物》1994. 12, 頁 7, 圖 6; 頁 9, 圖 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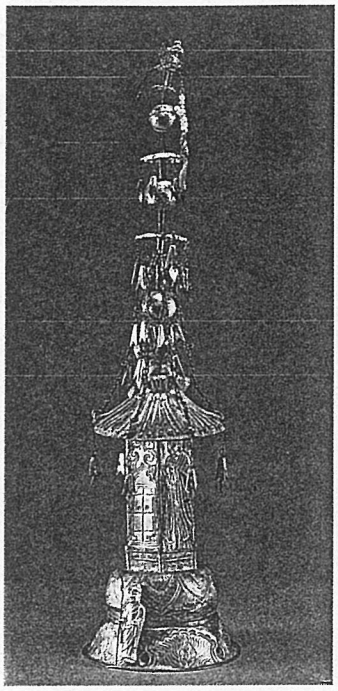


圖 3　銀鎏金法舍利塔形舍利筒　內蒙古巴林右旗白塔天宮出土　通高 42.0 cm. 宿白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大考古發現》(北京, 1999), 頁 4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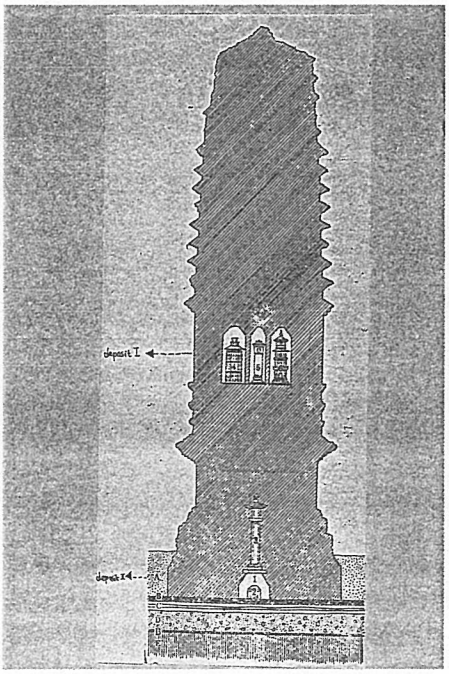


圖 4　北鄭村塔塔身及塔基舍利埋藏位置圖　河北房山北鄭村塔　《考古》1980.2, 頁 148, 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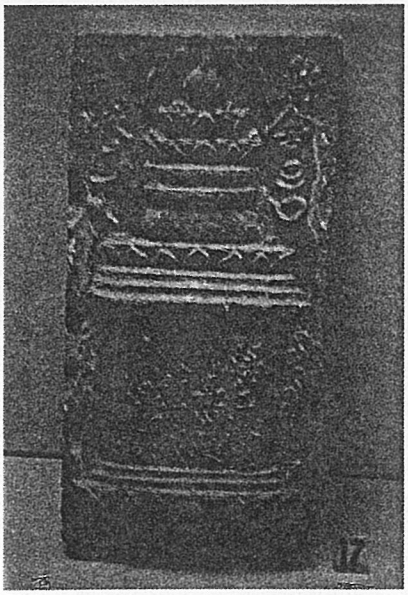


圖 5　河北房山北鄭村塔〈法舍利塔〉碑　河北房山北鄭村塔　現存北京首都博物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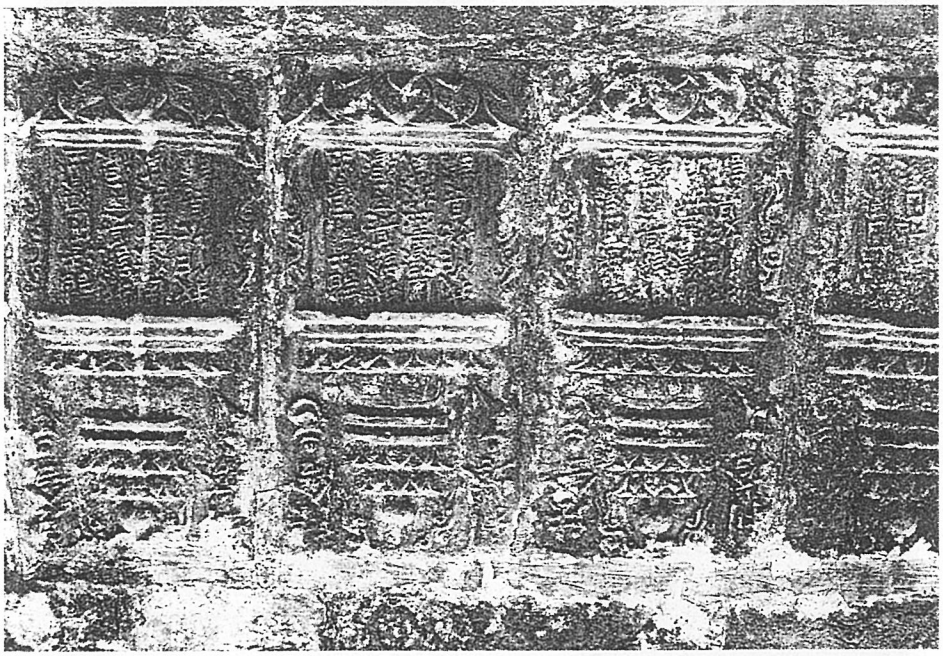


圖 6　河北房山雲居寺北塔塔身下段〈法舍利塔〉磚　河北房山雲居寺北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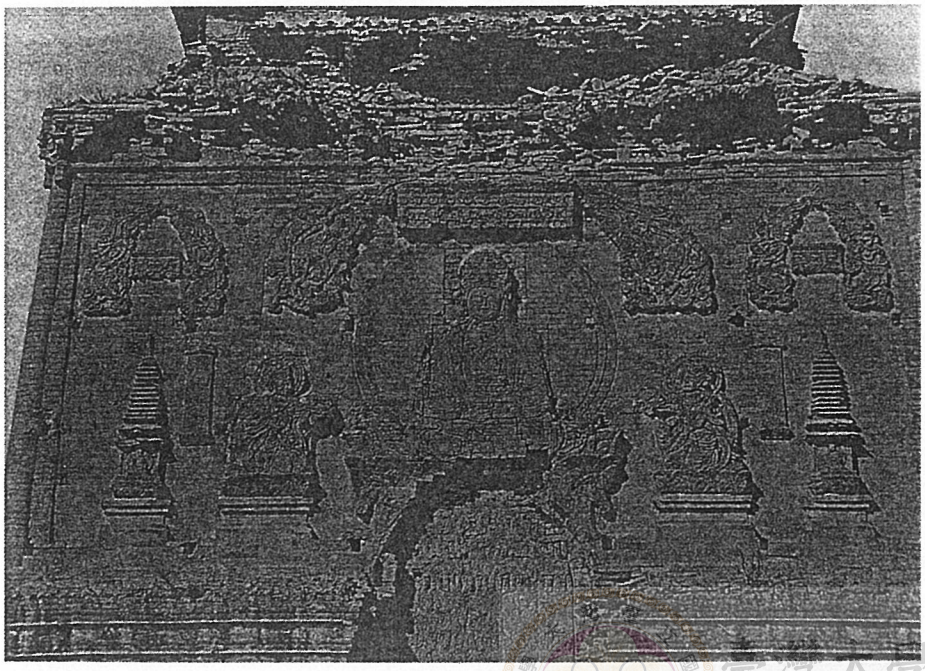


圖 7　遼寧朝陽北塔(延昌寺塔)塔身南面　遼寧朝陽北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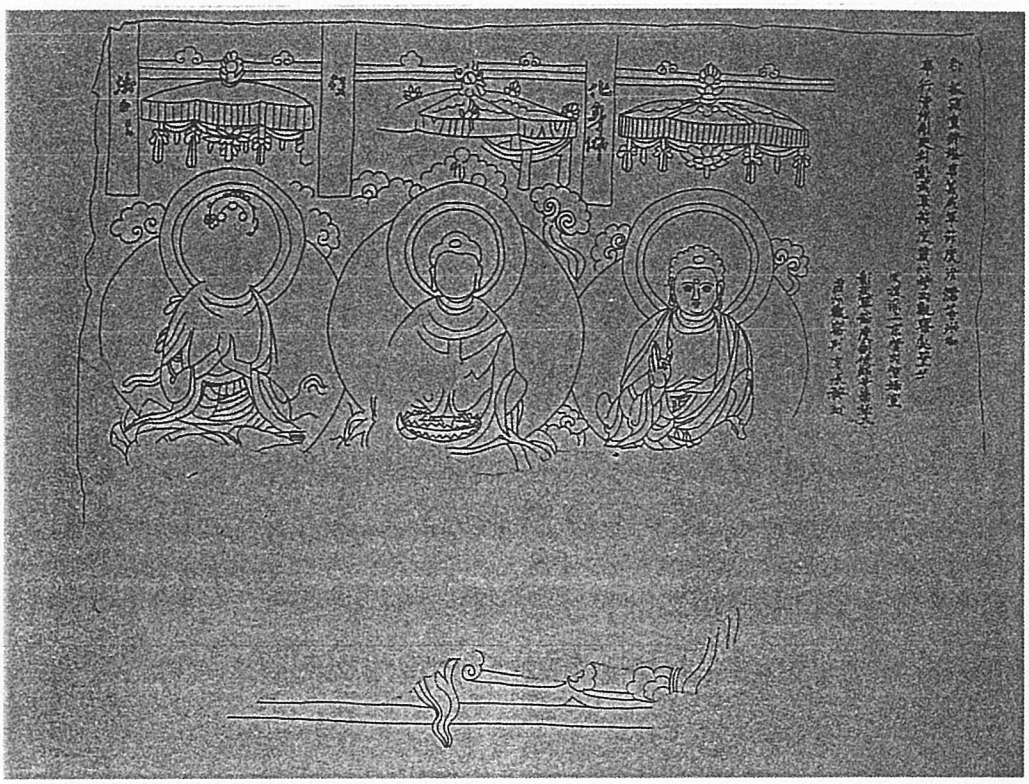


圖 8　遼寧朝陽北塔天宮東壁佛三身像線描圖　遼寧朝陽北塔天宮(1043)出土《文物》1992.7, 頁 5, 圖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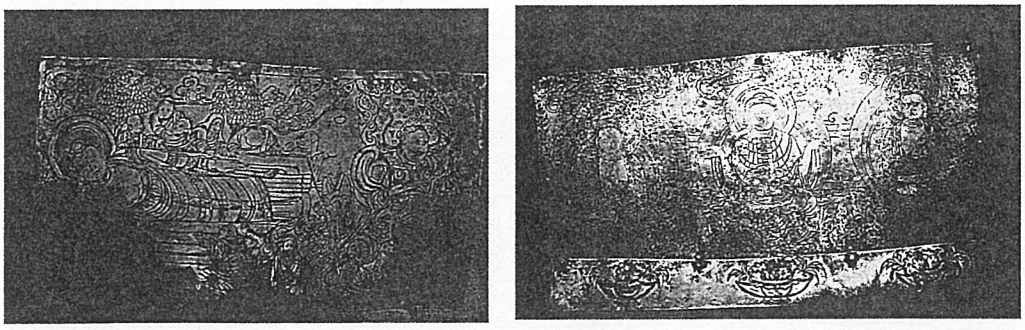


圖 9　木胎銀棺「佛陀入滅」與「佛三身像」　遼寧朝陽北塔天宮(1043)出土　長 33.0-33.1 cm; 寬 17.0-18.1 c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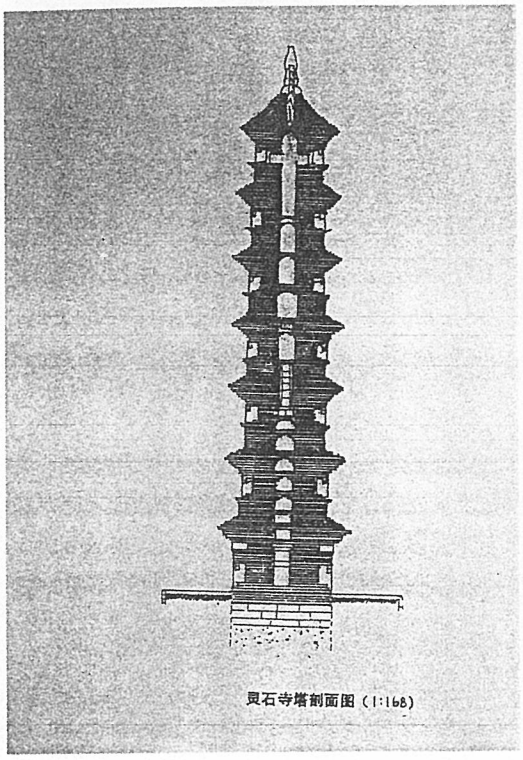


圖 10　靈石寺塔塔身中心柱內穴室分佈　浙江黃巖靈石寺塔《東南文化》1991.5, 頁 243, 圖 1。



圖 11　泥塑觀音菩薩像　浙江溫州白塔寺塔身(1115)出土　現存浙江省博物館　通高 74.0 cm　《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東京, 1997), 圖 93。



圖 12　《寶篋印經》(1007)　韓國平昌月精寺石塔塔身(十一世紀)出土　國立中央博物館,《佛舍利莊嚴》(漢城, 1991), 頁 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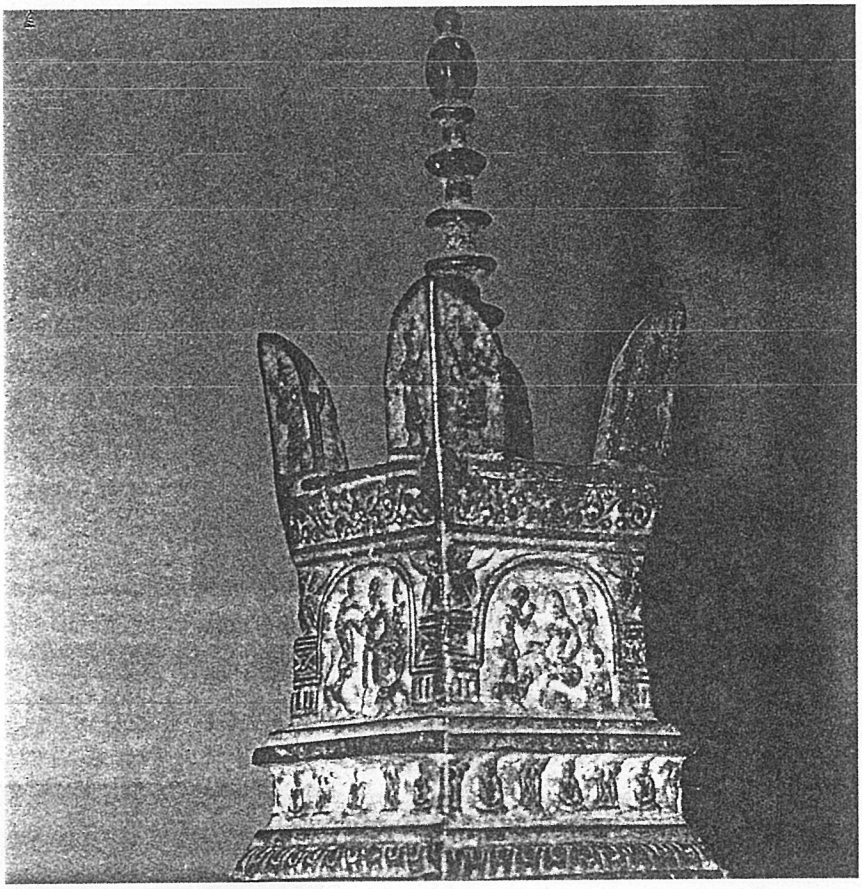


圖 13　鎏金銅「寶篋印塔」　浙江金華萬佛塔(1062)出土　現存浙江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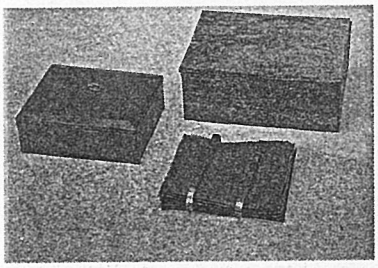


圖 14　金版經　韓國益山王宮里石塔塔身(八一九世紀)出土　高 14.8 cm。國立中央博物館，《佛舍利莊嚴》(漢城, 1991), 頁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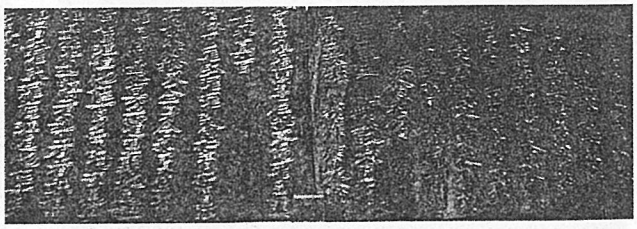


圖 15　銀版經　遼寧朝陽北塔天宮(1043)出土　高 11.3 c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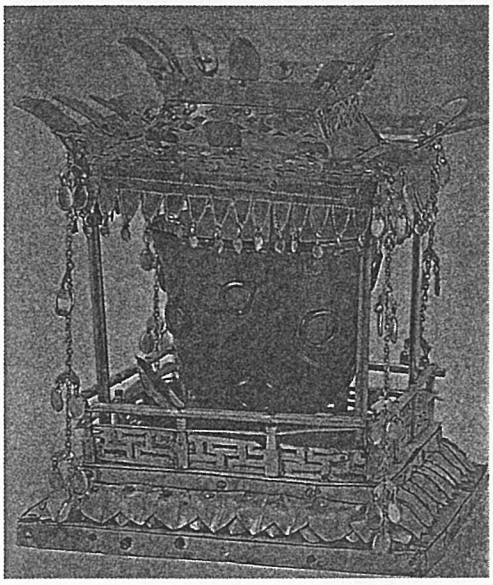


圖 16　金舍利函　韓國慶尚道松林寺磚塔（八世紀初）塔身出土　高 15.3 cm　國立中央博物館，《佛舍利莊嚴》（漢城，1991），頁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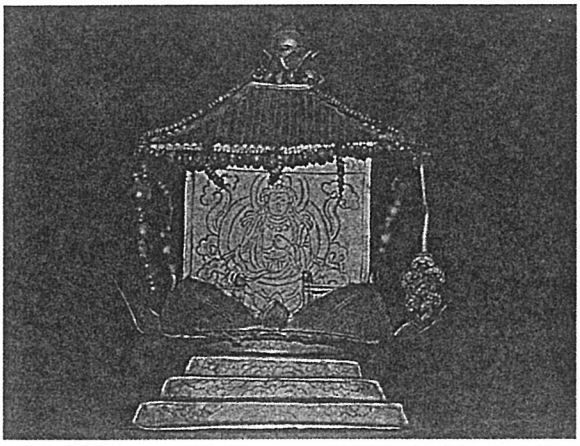


圖 17　金舍利盒　遼寧朝陽北塔天宮（1043）出土　高 11.0 cm。



圖 18　金銀經筒　遼寧朝陽北塔天宮（1043）出土　殘高 39.0 c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